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 李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 周恩来接待斯诺访华内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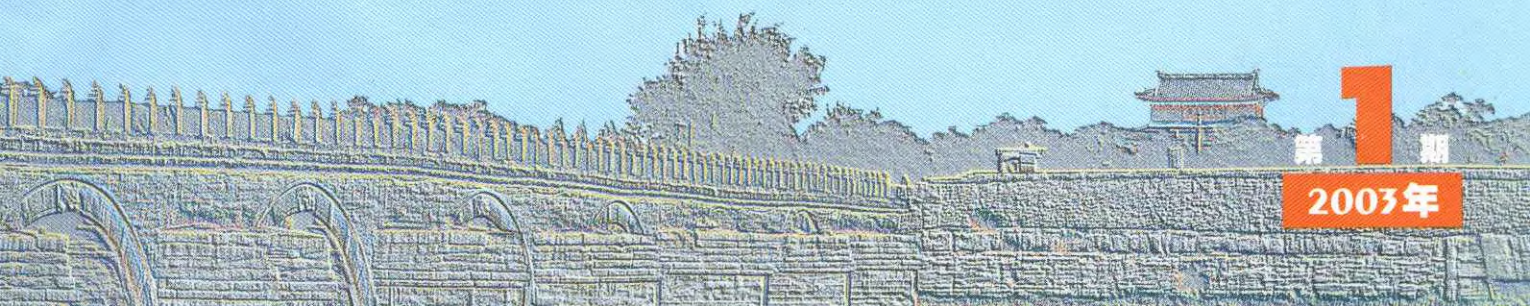
■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公布之后

■ 目睹一九七五年淮河大水灾

■ 蒋介石退台后的反省

第 1 期
2003 年



目 录

特 稿

1 任仲夷精辟解说“三个代表”……李宜航 魏 辉

2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李 锐

求 实 篇

4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徐庆全

9 周恩来接待斯诺访华内情……刘奋之

11 兵团人新疆戍边……陈明章

亲 历 记

14 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张广友

22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梁志远

人 物 志

26 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卢蒙坚

28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雷 颐

33 毛泽东弟媳庞淑谊的平民生活……非 可

38 丁文江的治军梦……吴小龙

春 秋 笔

40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反省……牛 钊

46 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吴永平

53 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安晓意

文 荟 园

56 《白毛女》从延安进北平……丁 帆

60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经过……窦应泰

英 杰 谱

64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李松凌

69 科教界一代宗师张维院士……李开鼎

一 家 言

13 民主也不能不急……杜导正

72 有感于爱因斯坦的名言(外二章)……李一鑫

古 镜 台

75 老皇帝悲歌……官伟勋

致 读 者

80 新年寄语……本刊编辑部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镔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执 行 主 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理 事 单 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 4.80元



任仲夷精辟解说 “三个代表”

编者按:本文是《羊城晚报》记者李宜航、魏辉在十六大期间走访十六大代表任仲夷的报道,本刊特予转载。

十六大会议期间,已88岁高龄的任仲夷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先伸出了三个指头,又伸出了一个指头。他幽默地说,“三个代表”,一个都不能少。

“三个代表”是防“左”思想武器 任老说,“三个代表”,很多代表都谈过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三个代表”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利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很赞同。

任老说,这次,“三个代表”要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

任老高兴地说,把“三个代表”纳入党章,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很好。

“三个代表”少一个也不行 任老谈到了“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任老说,这个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但不止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以后,不能只想到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政治利益、政治权利。对任何人,只要他没有犯法,他的政治利益,是不能侵犯的。要做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必须使每个人都知知道什么是他们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什么是他们的政治利益。

任老认为,只有首先做好了“三个代表”中的前两个代表,特别是第一个代表,才能做好第“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只有搞好了“第一个代表”,生产力发展了,群众“吃喝拉撒睡”的问题解决了,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谈得上照顾人民的经济利益;只有搞好了“第二个代表”,文化先进了,精神富足

了,才能谈得上人民的政治利益。

任老说,第一个、第二个代表做不好,第三个代表也做不好;但第三个代表做不好,前两个代表也做不好。只有做到第三个代表,才能做好前两个代表。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是不可分割的。

任老还提到了政治文明。他说,把它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放在一起,这很重要。至于政治文明包括哪些内涵,还要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认真研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谈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问题,任老也作了深刻的阐释。

他说,依法治国的“依”是依靠的“依”,而以德治国,就不是“依”而是“以”。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

任老说,对道德,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高标准道德,也有低标准的道德。不犯法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是作为一个人起码的道德标准,比如不偷鸡摸狗了、不坑蒙拐骗了、不谋财害命了,等等。如果违犯了这个起码的道德,就是犯法了,就不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法律问题了,“要戴手铐的啊”。

任老说,也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达到这些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不容易。但做不到,能给法律处罚吗?只能教育,让他学雷锋,他不算犯罪啊。以德育人,很重要啊。

任老说,所以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道德高了,犯罪自然少了。在如何贯彻执行这两者上,任老说,方法不同嘛,一个是强制,一个是教育,两者都要。

先进文化也要“百花齐放” 最后,任老谈到了坚持“双百方针”问题。任老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分重要,这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千万不能忘掉它,没有它,就谈不上先进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必须是符合“双百方针”的,不是一花独好,一家之言。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 李 锐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1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

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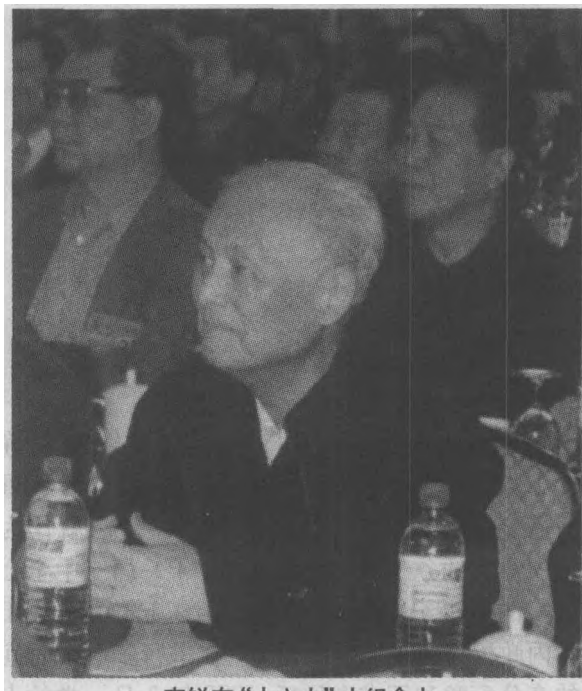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



李锐在“十六大”小组会上

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正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此文为作者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小组会上的发言)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

● 徐庆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后,整顿党风、重新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党的优良传统,就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凸现在全党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和征求意见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这一《准则》。细读《准则》,可以看出,十二条《准则》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纪律等方面的规定。

《准则》从酝酿到公布,至今已经20多年了。现今,我们党的建设的各项法规措施已比20多年前有了重大的进步。因此,研究党建的历史,这个《准则》在新时期以来的奠基作用不可低估;《准则》公布之后,全党上下切实贯彻《准则》的热潮也值得重温。

保证《准则》的完全贯彻执行,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准则》,《准则》在开篇论述说: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

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是,治疗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1980年2月,《准则》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发表了社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准则》是党的一项重要法规,是党章的具体补充。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特别是吸收了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针对当前存在的党风党纪问题,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社论号召:“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时,广大群众也应该以《准则》的要求来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帮助我们党加强党纪,搞好党风。”

《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准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

保证《准则》的完全贯彻执行,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经历了正反两方面教育的广大党员,必将大大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许多老党员坚持真理,拨乱反正,敢于同一切错误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模范行动,正在有力地影响和带动着全党。以公诸于众的《准则》为标尺,全体党员的互相监督,以及广大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也将给全党执行《准则》以巨大的推动。同时,执行《准则》还有党的纪律作保证。因而我们完全相信,这个《准则》是能够贯彻执行的。

《人民日报》等党的各级报刊,发表了一批对老革命家的访问文章,从党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角度,阐述《准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人民日报》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家长制》为题,发表曾长期担任中组部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安子文关于《准则》的谈话。在谈话中,安子文从党的历史谈到党的政治生活的“两种传统”。他说:一种是好的传统。这就是像延安整风那样,在党的会议上,对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认真进行讨论,不回避矛盾,不害怕不同的意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不分职务高低,大家都从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实际的情况出发,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凡属大事,就坐下来集体讨论,反复审度,大家一起来分辨是非,衡量得失。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另一种是不好的传统,那就是搞“一言堂”、家长制,一个人说了算,容不得不同意见。对不盲目附和的同志,戴帽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现象,在党的幼年时期发生过。但那时党成立不久,还谈不上成为习惯势力。这种东西变成一股习惯势力,具有很大的强制力,主要是在两段时间内:一段是内战时期的某些时候,一段是1966年以后的10年间。人们的头脑被束缚得死死的,思维和行动的方式都被禁锢在固定的格式之中,党的生机被压抑了。当这种现象泛滥的时候,破坏,挫折,失败,就一一发生了。

针对“另一种不好的传统”,安子文指出:“一言堂”、家长制那一套,是封建的东

西,比资本主义还落后,是同我们党的性质不相容的。搞“一言堂”、家长制,势必侵犯广大党员的权力,这是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生活搞不好,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搞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言堂”、家长制那一套,也是同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

安子文强调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作为一条党规党法肯定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立下了党规党法,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上上下下,还要继续作很大的努力。从今以后,无论哪一级党委,无论哪一个人,如果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在党内就是非法的,每一个党员都有抵制的权利和责任。

《工人日报》发表了李维汉、黄火青、帅孟奇三位老党员结合党的优良传统,谈学习《准则》的体会文章。



革命老前辈帅孟奇大姐感慨地说：湖南有句老话，“成家犹如肩挑土，败家犹如浪冲沙”，党风也是如此，要培养一个优良的党风很不容易，然而败坏起来是很快的。你们看，“四人帮”横行十年，把我们的党风败坏成什么样子，说起来真令人痛心！这些年来，有些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民主作风差了，脱离群众，不讲真话，搞特殊，铺张浪费；有的喜欢吹捧，听奉承话，什么党纪党法都置之度外。这些党员的行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现在好了，《准则》公布了。好的《准则》，好的党风，一定会带出好的民风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大家添砖加瓦；要培养一个好的党风，需要全党同志努力。

谈到《准则》关于反对特权的有关规定，帅大姐以古代季文子以俭为荣的故事为例，语重心长地说，搞特权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在封建社会像鲁国大夫季文子那样的大官能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更应高出他千万倍。《准则》公布以后，我希望全党三千多万党员同志都能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会重新发扬起来，党的政治路线会更好地贯彻执行。

为了配合《准则》的宣传，《人民日报》以及各地的媒体，开始了建国以来声势最大的批评监督宣传：宣传正面典型大张旗鼓，曝光反面典型也同样大张旗鼓，指名道姓，不遮遮掩掩。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一：独断专行的陈永贵下台

《准则》第二条要求全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这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专断作风，不但使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侵袭，而且给经济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所搞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个人专断下的产物。

在“文革”中，陈永贵是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树立起来的。随着陈的官位升高，在山西也产生了“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

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阳做的也都一切照搬。”陈永贵所主持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西水东调”工程的计划，是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萧河水，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废弃西边原有的30多万亩水浇地而保东边的几万亩水浇地，破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制造了新的水害。因此，工程计划提出时，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但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则以“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项目”的态度，坚决上马。结果，投资由原来的2000万一直追加到9000万，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到“文革”结束后，这项“为大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止。

显然，这一项工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权力独断专行，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程。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虽然陈永贵仍身居高位，但广大干部和群众和新闻媒体响应党中央整顿党风的号召，对照《准则》，对这项“蠢事”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揭开了这个荒唐工程的盖子。该报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揭示了这桩“蠢事”产生的根源：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报道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了雪片似的

来信。读者结合《准则》，对这种“蠢事”作了精辟的分析。读者王晋军在来信中，着重分析了陈永贵的独断专行。他指出：家长式作风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意识。它之所以能在我们社会中蒂固根深，阴魂不散，是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不开的。《聊斋》不是就有当

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老百姓只得“侧目视，侧足立”的描述吗？至于“朕即国家”、“君权至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人说了算等等，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建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家长作风触及不大，抨击不力，老百姓对当“官”的，下级对上级，好像就不能有任何异议，更不用说有非议了。十年浩劫，更使社会倒退到愚昧状态，家长式作风泛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读者来信的支持，显示了《准则》在广大党员群众中的威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些记者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了40多天的采访，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一组披露了十年来大寨弄虚作假的真实情况，一组则从陈永贵所奉行的“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和“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观念出发，揭露其在干部任用上的家长作风及帮派路线。这两组内参稿件，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对“西水东调”工程的揭露，只有在整顿党风、学习贯彻《准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对于这一工程的批评，不仅使陈永贵下台、为“农业学大寨”奏响了哀歌，也给多年来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生产的“政治模式”敲响了丧钟。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二：商业部长被点名

干部享受特权，是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遗毒作祟的结果。反对干部的特权，是整顿党风的重要内容。《准则》在第十一条对此作了严格的规定：“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北京著名的丰泽园饭庄工作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通过学习《准则》，上书中央纪委，批评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庄搞特权的情况。以此为契机，新闻媒体开始了对干部特权思想的批评。

1980年7月12日，陈爱武在给中纪委的信中，从自己亲身工作的经历，揭发了一些有关的官员常常以工作名义，到饭庄大吃大喝却以“吃客饭”的规定付费的特权现象。这些“特殊宾客”大多是部长、局长、主任之类的人。在这批“特殊顾客”中，国家商业部部长王磊则是一位常客。从1977年以来，王磊到饭庄“吃客饭”仅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1980年王部长两次“客饭”应付费124.92元，但只付19.52元。至于没有留下菜单的“客饭”费，当然就更多了。

其实，在当时，不仅商业部门，其他部门也是如此的。只不过不是“吃客饭”，而是名目繁多的“试用”、“试看”之类的不正之风。因此商业部

部长王磊的行为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陈爱武的揭发,得到了新闻媒体的支持。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青年厨师陈爱武敢于向特权挑战》为题,报道了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的勇敢行为。第二天,《人民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刊登了中纪委表扬陈爱武,批评王磊的通报和中共国家商业部党组讨论王磊错误的决定。

陈爱武对商业部长的批评,也招致了一些享有特权的人的恼火。但是,有《准则》在,有新闻媒体和中纪委的支持,陈爱武是理直气壮的。

而王磊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胸怀是坦荡的。陈爱武指出错误后,他在几次会上作了检讨,还亲自到丰泽园饭庄认错,补交饭钱。不仅如此,他还责成商业部系统的饭店修改了不合理的“客饭”制度。

在现在看来,一个部长吃饭少付费或不付费,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在《准则》公布之后的学习热潮中,在“文革”结束后的封建遗毒极待肃清的情况下,陈爱武的揭发就有了时代的意义。因此,这件在今天看来多半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的事情,其当年所具有的意义至今并没有褪色。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三:造反派部长落马

198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时任国家化工部副部长的李国才弄虚作假、专横跋扈的行径。为达到醒目的目的,该报用了三行大标题:“弄虚作假曲意包庇终归不能掩盖事实真相

‘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揭穿 许多群众不能容忍李国才当化工部副部长”。

据报纸报道,李国才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建设公司加工班班长,在十年动乱时期,是吉林市造反派头头,当上了吉林市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后来又调北京,任国家石化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

在李国才当加工班班长时,设计了一种“横水管蒸汽立式大锅炉”。当时身为吉林市革委副主任的他,到处标榜这种锅炉的设计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国内没有看见过,世界资料也没有发现,是全国头一份”,是“锅炉史上的创

举”,“产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三少一多’(钢材少、耗煤少、用电少、发汽量多)”,等等。1973年5月,吉林市劳动局根据国家有关锅炉设计和制造的规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国才式锅炉”的设计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该设计和制造上的缺陷、隐患很多,提出了六项建议,希望进一步改进,经技术鉴定后再制造。国家劳动总局、吉林省劳动局等单位,也先后派技术人员进行了考核,针对设计上的问题,建议在没有进行鉴定之前停止制造,停止散发图纸,停止宣传。

科技人员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李国才却大为恼火,硬把善意的建议扯到“路线斗争”上来,大骂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权威”,“要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还利用他所能控制、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戏剧等宣传工具,大肆吹嘘自己,围剿科技人员。他还支持有关单位以他为主题,编写话剧、电影和京剧剧本。京剧《春蕾初绽》,就是反映围绕锅炉问题的这场“斗争”,主人公是某部副部长,名叫郭之才。这个剧本是经李国才亲自修改审定的,排练出来后,当作“政治任务”组织群众观看。为了突出自己,他把锅炉定名为“国才式锅炉”,同意把加工班改为“李国才加工班”。加工班休息室里,设有一块小黑板,专写李国才的话作为语录,加工班院内,搞了个360平方米的“李国才事迹展览馆”,每一句话,每张图片都是他亲自选定。李国才当上国家石化部副部长后,石化系统在这里办了33期学习班,极力推广李国才的“经验”,大量散发“国才式锅炉”图纸。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辨明真伪,避免后患,吉林省劳动局两次组织专家进行鉴定。技术鉴定的数据说明,这种锅炉的结构及其技术经济指标都是落后的,根本不是什么“锅炉史上的创举”。但骗局并未能彻底戳穿。1979年3月,国家经委和劳动总局根据技术鉴定和使用单位的调查资料,草拟了《关于处理国才式锅炉问题的通知》,列举出锅炉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处理意见。但个别中央级领导人庇护李国才,坚持要把“国才式锅炉”在化工、石油企业内部使用;还说什么:李国才是个老工人、老模范,这是“对劳模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李国才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否定技术鉴定,欺骗领导。国家(下接74页)

周恩来接待斯诺访华内情

● 刘奋之

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交往,始于1936年7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从陕北安塞到谭家营陕西省委去,途中遇到了从北平来苏区访问的斯诺。这一次见面,周恩来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新中国建立之后,斯诺又先后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华,三次受到周恩来热情周到的接待。

1960年7月初斯诺来华访问。当时他经济上比较困难,在饭店吃工作人员四角钱一份的饭。斯诺向我工作人员表示,过不了多少天,他就要破产了。他说从1951年后,就没有正式职业,完全靠过去的积蓄生活,而写书在美国也赚不了多少钱。

8月2日,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有关斯诺来华后的接待问题。周恩来指示:1、经费问题:可以购买电影拷贝给他5000元或1万元。这个数目请他自己选择,由他自己决定钱数。由黄华、龚澎出面和他谈。2、沈阳、大连市长都可接见他,可留他在大连多住两三天,洗海水浴,休息。要他晚几天坐火车回京。3、可以让他拍系统的照片和电影,但应事先做好准备。4、去西北旅行的路线:可考虑包括西安、延安、保安,包头是否可去,也可研究。5、他要向朱委员长面交史沫特莱的遗礼,可以待朱委员长回京后安排。6、同意在斯诺从东北回京后,组织一

些熟人去和他谈谈。同意请姚依林同志和他谈谈。

7、总理准备在他西北之行回来后,再和他谈。

一个大国的总理在百忙之中,对一位外国记者作如此关切、周到的安排,可称罕见。

斯诺离京之前,总理托人传话:同他可以谈得深些,带些理论性的,因为他了解中国的过去,可以回去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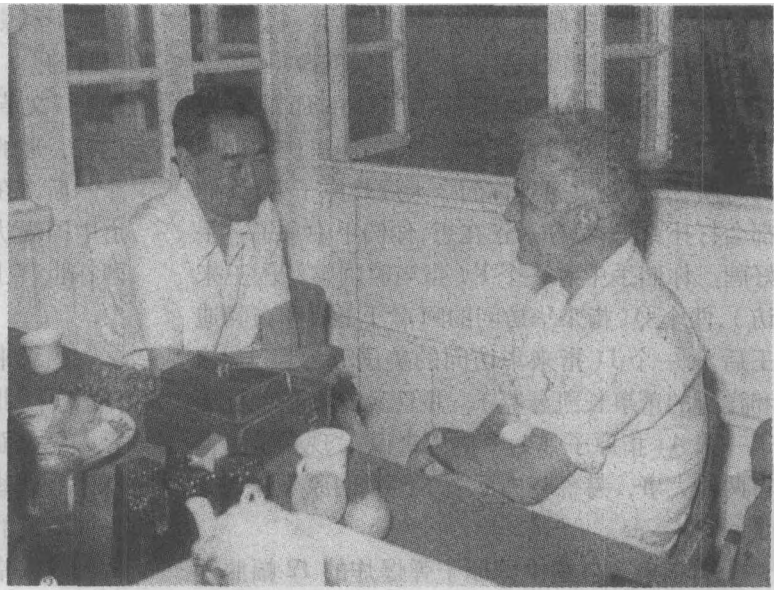
8月3日,周恩来决定亲自陪同斯诺参观密云水库,途中总理对斯诺交来的30个问题,概括起来加以回答,参观后又继续交谈。

10月18日,斯诺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在他的要求下,周恩来再次会见了。

10月31日,毛主席接见了斯诺。

斯诺访华后于1963年初,出版了《大河彼岸》一书,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新中国。

1963年3月11日,周恩来的秘书浦寿昌同志电话告外交部:“总理想问一下宦乡同志,研究室对斯诺回去后写的《大河彼岸》研究过没有,是



1960年8月,周恩来与斯诺在密云水库

否有什么翻译计划。”周恩来还要宦乡、龚澎向在华外国专家了解对《大河彼岸》一书的评价,以及需否在中国翻译出版。

1963年10月以前,斯诺又多次来信申请访华。总理让浦寿昌同志转告龚澎:“总理觉得,斯诺屡次来信和寄书来,我们都未答复,是一个疏忽。总理请你立即写一封信给斯诺,在信中说明,他历次来信都已收到,寄来的书也已转送各领导人。对于迟至现在才复,表示歉意。至于他要求访华事,在信中可说正在考虑,相信不久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此外,总理请你写一封信给EPP,如他从英国回来时途经瑞士,请他去探望一下斯诺,以示我们对斯诺的关怀。”

1964年1月23日,周恩来访问几内亚期间,在我驻几内亚使馆接见了斯诺,并亲切交谈。

1964年10月19日,斯诺再次访华。31日,周恩来和邓大姐接见了斯诺并宴请。同年12月,周恩来又两次会见了。

斯诺这次访华,意义十分重大。1964年10月,对中国来说,发生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一件事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标志赫鲁晓夫反华活动的失败;第二件事是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经历了1958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中国当时是一幅饥饿动乱的形象。而两件大事,则标志着中国已走出了低谷,奋发图强,重振国威。10月31日,周恩来拿着中国爆炸原子弹的12幅黑白照片,找斯诺谈话。周恩来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之后就改了口。现在又说这颗炸弹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要先进。”斯诺说:“我过去去保安,在窑洞里访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今天爆炸原子弹。你们都会打扑克吗?我今天正在想,你们手中拿了一手好牌。你们手中有一个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Q(指来华访问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J(指来华访问的美国商界巨子、怡和洋行的董事长凯瑟克),并且又向桌子上打出了一张A(指原子弹)。”周恩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原子弹上去了。”

周恩来自亲把中国原子弹爆炸的12幅照片交给斯诺后说:“龚澎都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你们

在坐的(指陈忠经、勇龙桂、唐明照等人)都没有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

回饭店后,斯诺说:“我真做梦也没想到他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It's going to be a big scoop),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第二天,斯诺回到了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轰动了全世界。

1970年8月10日斯诺第三次访华。周恩来先后五次会见斯诺。其中有四次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仅1970年11月5日的一次谈话就长达四个小时;1971年1月15日的谈话从晚上九点半一直谈到16日清晨五时四十分。

就在1971年1月15日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向斯诺第一次公布了我国1960—1970年十年间工农业生产的一些主要数字和工农业生产状况。

“文革”以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西方有些报刊广泛传播:“在文化革命中,整个共产党解体了。”“这个政权究竟能支撑多久?”

斯诺在没有听到周恩来的介绍以前,同西方所有记者看法一样,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摧毁了中国的生产,中国从此将一蹶不振。周恩来的介绍和他在中国历时将近三个月的各地采访亲见亲闻,斯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文革”给中国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但现在知道,减产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大潜力”。由于斯诺是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准来中国访问的西方记者,他的访华报道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的关注。斯诺在访华期间以及回去以后曾写出大量报道中国现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濒于垮台的形象。

周恩来在同斯诺的交往中,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些做法,在世界新闻史上是光辉的篇章;他同斯诺的深情厚谊,对老朋友的坦诚相见、热情周到的人格力量,也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吴 思)

兵团人新疆戍边

——《新中国屯垦戍边实录》续貂

● 陈明章

读了《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的《新中国屯垦戍边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作者许人俊)一文,颇感振奋。作为共和国目前唯一存在的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我感谢作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来龙去脉。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读了《实录》,人们了解的仅是新中国屯垦史的概貌;对于戍边,则着笔甚少(仅文末倒数第二小段述及),难窥全豹。外界了解不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今仍保持着军队的组织形式。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兵团要担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双重任务。在新疆5600多公里国境线上,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戍守着2019公里边境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疆兵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屯垦为手段,以戍边为目的。

1960年前,中国与苏联关系友好,中苏边境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嘴脸日益暴露,由此而导致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1962年4月,由于苏方的策划和诱骗,新疆伊犁、塔城的6万多边民带着财产、赶着牛羊,越界而去。基层政权瘫痪,农村组织解体,田园荒芜,牲畜失散,坏人趁火打劫,社会秩序混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北局责成自治区党委、人委和兵团党委,由兵团迅速组织民兵,立即赶赴边境布防,维护治安,劝阻越界;对边民出走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工二师以及兵团直属单位抽调干部810名、工人16750名,组成工作队,到边境执行任务。仅塔(城)额(敏)垦区(时为农七师第三管理处,后为农九师)就选派3000余名

干部职工,分赴塔城、裕民、额敏3县的11个公社、9个牧场,实行“三代”。近200名干部代理公社、牧场、大队、小队所缺的干部。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好转,被劝阻回归的边民5000多人,拦阻即将越界的牲畜12000头(只)。值班民兵全副武装,昼夜沿边巡逻,并在上列3县边境地区设立8个边境管理站(后称边防站,至今沿用)。塔城地区“有边无防”的历史至此结束。

同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后又决定在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建立“边境农场带”。自此,兵团在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长达2000多公里、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地区建起了50多个边境农场。50多个边境农场同其他农牧团场和各族人民一道,筑成西域长城,成为国际霸权主义和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不可逾越的障碍。

农九师“边境农场带”多数农场的许多连队建在基本上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地带,原因很简单:脚下就是国土。翻遍古今中外的屯垦史,大概只有新疆兵团的农工才经营过只讲耕耘不问收获的“政治田”;只有兵团的牧工才有过放“政治牧”的壮举,弃近从远,赶着羊群通过所谓的“争议地”,以示主权。“争议地”,实则只能“争”,岂容“议”!在“争议地”耕种,收获寥寥,许多年份的收成连种子也不够,却有收无收年年种;在“争议地”放牧,常常置于苏方枪口下,牧工置生死于度外。

1964年8月12日,现属一六一团的一分场三连在邻近边境的6号、8号地播种冬麦。苏军见状,开来5辆大小汽车,跳下几十个军人,阻挠我正常生产,空中还有直升机助威。几名苏军在

我国领土上插了一排柳树枝,指着树枝对我农工说:“树枝东边是你们的土地,树枝西边是我们的土地。”我拖拉机手不理睬苏军的蛮横言行,继续作业。苏军士兵手挽手排成队挡在我机车前,又将汽车开进我耕地,一字排开,向我方冲来。职工方荣飞、龚祥瑞躺在苏军军车前,用身体阻止苏军车前进。政治指导员孙宪忠带领其他农工与苏军说理,不时你推我搡,拳脚相加。相持两小时,苏军退回,三连接期完成播种任务。

一六一团的羊群转场,每年都要经历一场生死考验。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军沿苏中边界部署重兵。一六一团的羊群转场通道紧靠边境线。为防不测,经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一六一团组织3个武装民兵连外加一个独立排并请边防部队配合,护送羊群转场。民兵们赶着羊群刚上路,30多名苏军官兵就越界前来干扰阻拦。我方民兵反复声明: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转场,你们为什么要无端挑衅。苏军装聋作哑,只顾驱赶羊群。民兵们忍无可忍,纷纷挥起木棒向苏军砸去。苏军只好退回苏境,却又架起机枪向我方瞄准。民兵们毫无惧色,赶着羊群从容行进。

1969年5月20日,一六三团和加曼奇边防站的干部战士丁余生等5人在界河阿克乔克的龙口筑坝引水。苏军出动装甲车3辆、大炮两门、武装军人30余人,越过实际控制线进入中国一侧。他们绑架丁余生等5人,遭到反抗,便用枪托毒打,致使5人均被打昏,然后拖上装甲车,运至

(上接13页)尤其“文革”,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所以,与此有关的个人崇拜,人为夸大领袖作用等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重庆綦江大桥垮塌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

四,一旦条件成熟时,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原苏联共产党称中央监督委员会)应照列宁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

苏境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关押24天。后经我外交部9次严正交涉,苏方才将被绑架人员送回。凯旋的国土卫士受到上千人夹道欢迎。

同年6月10日傍晚,苏军越界闯入农九师一六一团牧一队放牧点,绑架我牧工。民兵们闻讯,立即手持铁锹等劳动工具前往营救同胞。混乱中,苏军悍然开枪射击,身怀六甲的女民兵孙龙珍中弹身亡。孙龙珍成为第一个倒在苏军枪口下的兵团人。同年7月21日,一六三团报请上级批准,组织收割“争议地”的冬麦。团场依例成立指挥部,派出武装民兵保卫夏收。我方收割机梯次行进收割,苏方军用直升机在收割机上空盘旋,但终未造次。

1975年10月,苏军在中国领土丘尔丘特河北岸(属一六一团辖区)偷设了一道长135米、宽9米、高1.5米的屋脊型弹簧圈铁丝网,企图阻挠我羊群正常转场。11月7日,经总参谋部、外交部同意,一六一团组织31人用15分钟将铁丝网拆除。据不完全统计,像此类边境纠纷,农九师共经历了数十起,直至苏联解体方告结束。其他各边境农业师的护边卫国之举与农九师大体相近。

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到边境农场视察后,感慨万千,一致认为:兵团是共和国永不移动的界碑;兵团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兵团人是共和国伟大的公民!

(责任编辑 吴 思)

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北京的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如“文革”时期中央出了“四人帮”那样大案,当时的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己处理自己很难下手呢!

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的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中国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全国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风险的。“五四”号召的民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民主也不能不急

● 杜导正

编者按：此文是“五四”运动80周年前夕作者应某刊邀请而写。某刊曾想发表而未发表。编者以为此文完全符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第五部分精神，在今日仍有很现实的意义。

今年5月4日是我国伟大“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

中国的民主现在怎么样了？今年3月15日下午，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嘛，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除我们“现在每日都在进步”一句，评价上似嫌高了些以外，别的，是得体的，中肯的。至于中国民主现在不要急一句，我以为，这话若接着加一句，今日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那就妥帖了。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邓小平这一套，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些，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爱护。甭说“文革”时了，“文革”前，包括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也数这20年较好。当然民主、人权这个领域里，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较经济领域弱了一些，后进了一些。我以为这也是事实，是不必讳言的。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

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周期率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从民主法制的体制机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这种提法与“五四”倡导的民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根源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官员实际上实行着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那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朱镕基说得对，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的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近日又展开了“三讲”活动以外，还可以：

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

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1958年“大跃进”，（下接12页）

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 张广友

1975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的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水灾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以后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如今,这场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27年了,在中国报刊和新闻史上,一直是个“空白”。我是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在中国新闻报道史上补上这一页,使后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和借鉴。

一 灾情严重 死人最多

1975年8月5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其中大型两座、中型两座),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致使河南、安徽沿淮地区,千里平原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河南省最为严重,据统计,河南省受淹的有32个县,347个公社,耕地1800多万亩,受灾地区人口约1000万,死亡3万多;大牲畜死亡近百万头,倒塌房屋500多万间。洪水冲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小商桥到确山县段103公里。其中毁坏最严重的有16公里,路基桥梁全部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在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这些地区的公路全部被淹毁,电讯中断。地处垮坝的板

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的下游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板桥下游的遂平县县城被淹,一些工厂被毁,墙壁倒塌,房盖顺水漂走,机器设备被冲得无影无踪。水库下游的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死人最多。

安徽省受灾的主要是阜阳地区的六个县,耕地面积300多万亩,人口150万。其中比较严重的是阜南、临泉、界首、颍上等县。

水灾发生后,中央十分重视,8月9日连续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并立即组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农林部长沙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丁志辉,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为副团长的13人中央慰问团,带着《中央慰问电》于8月11日飞往灾区进行慰问。我是新华社总社派去的随团采访的两名新闻记者之一(另一名是摄影记者王新庆)。

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平易近人,很关心记者,关心宣传报道。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他说:“这次中央慰问团既是慰问团,又是‘工作团’,在做好慰问工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协助地方政府做些工作,解决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我对此不理解,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这次水灾十分严重,他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那么,这些水库,特别是两个大型水库为什么垮坝?又譬如,为什么洪河的洪水下泄的那么慢?”他说:毛主席说:“看来我们的国家还没统一,列国时国和国还有个协议……”纪登奎说:“豫皖之间水利纠纷由来已久,据说洪河入淮的河南和安徽边界处相距不远的地方,两省群众各修一座拦河大坝。水多了安徽那边把闸门关上,或者开的很小,河南的洪水就泄不出去;干旱水少,河南那边就把闸门关死,安徽那边就没水喝……这次中央决定要坚决拆除这些阻水工程,充分利用行洪蓄洪区,使洪河水尽快下泄……你们可以随团去到现场看看,搞些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

慰问团回京之前,纪登奎同我和《人民日报》的随团记者安子贞说:你们实际上是中央慰问团的成员,这次深入第一线参加抗洪抢险,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次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炼,以不超过两千为好。他一再强调“不要超过两千字”。纪登奎对我说:鉴于文字所限,有些内容归纳不进去,你们新华社可以写内参进行专题报道;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全面的内部报道。

二 灾情见闻实录

空中掠影 我第一次看到灾情,是8月11日随中央慰问团乘专机从灾区上空掠

过。飞机经郑州南飞不久,进入许昌地区即进入灾区。俯瞰辽阔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绿黝黝的庄稼不见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犹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边。午阳、西平、遂平、上蔡、平兴、汝南等大部分县城都已经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和没被完全淹没的房顶上站着许多人……村庄的房屋和田野的庄稼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了,偶尔看到一些大树枝头还露在水面上……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些,飞机低空缓慢飞行,经南部的泌阳、确山,降落在确山境内的一个空军基地的机场,我们看了看表,在这一片汪洋中的大地上空,飞机从北到南飞行了30多分钟。究竟直线距离有多远说不清楚,从地图上看没有千里,也有几百里。对如此大面积灾情,大家普遍惊叹:没有想到,也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范围的严重水灾。

垮坝后的板桥水库 第二天,我们转乘空军的米八直升机,从确山基地,向北飞向受灾最重的驻马店地区,察看了被洪水冲垮的板桥水库。这个库容为4.9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8月7日深夜,终因雨量集中,上游大部分小型水库和堰



洪水中的救灾船只

坝纷纷被冲毁,入库水量骤增达 9.5 亿立方米,超过库容 81%,不负重容而垮坝。千米大坝决口 350 多米,近 10 亿立方米水量,倾库而泄,凶猛的洪水咆哮而下,水库下游 20 华里宽、百余里长范围内被洗劫一空,冲毁了京广铁路,奔向豫中平原。我们站在这座被冲毁的水库残骸南端向库区远眺,看到坝内库底朝天,坝下决口处被洪水冲出了方圆数千米的一个大坑,好像一个湖泊,里面是满满的水,据说最深处可能有十多米,有的说有几十米,究竟有多深,还没来得及去探测。冷眼看来,还以为这是水库呢。水库有关方面的领导者们一再向我们解释说水库的闸门都已统统打开了;溢洪道已经不起作用;是大水漫过大坝而冲毁的;主要是来水量大、时间集中;是不可抗拒的等等。有的水利专家和权威人士补充说:这个水库是 50 年代初期建造的,是用人工修建的土坝,由于受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限制,坝基质量差,也是垮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县领导汇报灾情 12 日下午,我随中央慰问团一行乘直升机到达驻马店地委所在地的驻马店镇。地委用直升机把该地区受灾严重的遂平、西平、汝南等七个县的主要领导接到地委。慰问团听取了他们关于灾情和救灾情况的汇报。

地委书记苏华说:这个地区是这次河南、安

徽两省受灾最重的地区。区内有 50 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垮坝(其中大型两个,中型两个)。仅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午阳工区境内的石漫滩两大水库垮坝之后,库内 13 亿立方米洪水,居高临下,倾库而出。垮坝时几十米高的水头,奔腾咆哮,呼啸而来,犹如一座大山压将下来,势不可挡。当时正是深夜,人们在熟睡之中,毫无思想准备,在梦中被洪水卷走。水库下游几十里宽范围的人员、牲畜和房屋财产,以及庄稼、树木等被一扫而光。

刚从水灾第一线回来的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说:遂平地处板桥水库下游,受灾最为严重。洪水所到之处,不仅地面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有的甚至掘地三尺,刮走了地皮,留下一片沙砾,不仅冲毁了铁路路基、桥梁,冲翻了旅客列车,冲毁了工厂,冲走了机器,竟然把县化肥厂四吨半重的锅炉冲到宿鸭湖。炮二师靶场上的大炮被冲得无踪影。由于水库垮坝是在 7 日深夜和 8 日凌晨突然发生的,人们没有提防,水势凶猛,来得特急,水库下的绝大部分群众被洪水卷走……李天寅说:板桥水库位于本县西部山区,居高临下,向东倾斜,控制着全县 80% 土地,只有嵯岈山公社和少数几个公社局部地方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它是悬在全县人民头上的一库大水,现在看来它是

一颗“大炸弹”,板桥水库垮坝给遂平县造成的是毁灭性打击。现在全县电话线路已经全部被毁,信息中断,县里的各社队失去了联系,究竟死了多少人现在无法统计,我估计可能要在 16 万左右。其中包括 200 多名县里的机关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的驻队蹲点干部。

午阳工区领导说:三天来的暴雨,加上上游几十个中小型水库垮堤,致使石漫滩入库



由电线杆子看水深

的洪水达3亿多立方米,超过库容量的两倍多。终于8日凌晨,不堪重负,水库大坝全部被冲垮,使洪河两岸一片汪洋,奔腾咆哮的洪水直抵西平,穿越京广铁路,进入豫中平原,沿途洗劫一空,死亡约3000—5000人。

据驻马店和有关方面领导汇报:这个地区的洪河、汝河上游(同是淮河的支流),共有4座大型水库,除板桥、石漫滩之外,还有一个地处泌阳县境内的东风水库,库容量为1.2亿立方米,入库洪水已达2.2亿立方米;另一个是地处确山县境内的薄山水库,库容量为4亿立方米,入库洪水已达5亿立方米。这两座大型水库,虽然入库洪水也都已经超过库容量,险情严重,但没有垮堤坝。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事后曾对河南省有关方面领导说:“你们应当组织有关方面认真调查一下:为什么同在一个地区的四座大型水库,两个垮堤,两个没垮?”

三 洪水冲毁京广路 豫中200万群众被围困

8月12日,水灾重点已经转到京广铁路以东,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的20多个县范围。其中以上蔡、汝南、平兴、新蔡等县最为严重。平地水深一般都在2—5米。据初步估计,这一带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有200多万。于是中央慰问团领导决定,立即分头到灾区视察慰问。

豫中鸟瞰 8月13日,记者随中央慰问团,在副团长、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下,乘直升机到灾区时看到这纵横数百里的豫中、豫东大地上,一片汪洋,下边一片白茫茫,水光接天,一眼看不到边际,少数地势较高,没有完全被淹没的屋顶上,成为群众避难逃生的场所,有的爬到了露在水面的树枝上。在一些还露出水面的堤坝或高岗处,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逃灾的人群,看到我们的飞机来了都齐刷刷站起来了,举起双手,仰面朝天看着我们,似在向我们呼喊……飞机上噪音大,究竟他们喊什么,我们一点儿也听不见。在漫无边际的涛涛洪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漂浮物,在顺水漂流。有蔬菜、木板、锅盖、箱箱柜柜;也有死猫、死狗、死牛、死羊,以及死人尸体……有时还看到一些漂浮来的房脊、房梁和麦秸垛,

有的上面还扒着人和猫狗等动物……目睹这一幕幕悲惨情景,令人感叹,令人痛心!陪同我们的驻马店地委副书记、上蔡县委第一书记杜保全说:上蔡县地势平坦,没有山区和丘陵,甚至小的土岗也很少。过去这里的群众有个习惯,水一来就上树、上房,水一过就下来,水来得快,走得也快,一般是一两天。可是这次水来得急,来量大,迟迟不退,现在全县有60万人被洪水围困,其中大部分是在屋顶和大树上,现在已经四、五天没吃到东西了。有些人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特别是爬在树上的,几天几夜吃不到东西,睡不上觉,疲惫不堪,有的手脚麻木了,眼巴巴看着他们一个个扑通、扑通地从树上掉下来,落水而死!躲在河堤上的群众,也因为几天来洪水不断上涨,无水地方越来越小,河堤不断塌陷,成群的群众眼看着被洪水冲走。现在这些地方一片汪洋,无路可走,有水无船,交通已经全部断绝,人出不去,食品运不进来,情况十分危急!人们处于绝望之中……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流满面。

经过上蔡、平兴、汝南等县察看之后,飞机最后降落在洪河和汝河交汇处的新蔡县,一路上所见和有关地方领导汇报情况大体相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洪水下泄的很慢,有的地方还在上涨,如何加快洪水下泄,及时抢救出这200多万人的生命,已经成为抢险救灾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河南省和各地有关部门领导一致认为,当前这些地方洪水下泄慢的主要原因是:洪河河道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有拦洪闸,洪河和淮河河道有阻水工程,安徽境内的行洪区没有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没有分洪、蓄洪。因此,洪水下泄很慢。

四 水上漂泊三天三夜

根据洪水下泄缓慢,200多万群众被围困的紧急情况,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方面组织中央各有关部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积极参加抗洪抢险斗争;另一方面,指示中央慰问团要协同地方领导,加速排洪泄洪。于是,我们在副团长、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下,由乘直升机视察,改为乘船沿洪河、淮河河道,协同当地领导和部队解决排除阻水工程和行

洪障碍,以及分洪、蓄洪问题。我们于12日晚从新蔡上船,沿洪河下行,开始了水上生活。

夜毁班台闸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同有关方面解决班台闸阻水问题。据河南省领导反映:这个地区洪水下泄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洪河有两座拦河水闸:一座叫班台闸,是经两省共同协商于50年代花了不少钱建立的,用以拦截和控制水位和流量。班台闸建成后,安徽总感到掌握不到控制权,于是,当地群众自发地在距班台大闸下游不到3公里安徽境内的黑龙潭拦河建立起一座大闸同河南对抗。

夜深了,我们的小船犹如一叶孤舟航行在大海上。夜雾茫茫,视野不清,船上灯光微弱,只有柴油机嗒嗒……不停的响声,响彻在这辽阔宁静的夜空。当时,船上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已经失去了任何联系。大家心情十分紧张,普遍担心的是怕遇上障碍物,发生事故,所以不得不走走停停,小心翼翼地 toward 班台闸方向摸索前进。

就在我们在夜雾茫茫中寻找班台闸时,部队的快艇上来了。他们是中央命令带着炸药,专程来炸毁班台闸的。很快就找到了班台闸的位置。此时班台闸的闸门全部大开,洪水已经从大闸上面漫过。整个大闸已经淹没在洪流下面,只有两岸高处的闸头还露在水面上。于是有人说:修建这样大的一座拦河大闸可不容易啊,现在洪水已经从闸上漫过去了,大闸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炸毁大闸?然而部队是奉中央命令而来的,他们的任务明确:按时炸掉班台闸,现在一切准备就绪,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于是隆隆巨响之后,班台大闸彻底摧毁了。

天亮了,我们继续寻找黑龙潭,转悠了好长时间,找不到黑龙潭拦河大坝。其实,我们就在黑龙潭之中,这里已经一片汪洋,黑龙潭大坝早已不见了。因为这是个土坝,洪水到来不久即决口,被冲毁得无踪影了。

五 安徽无雨遭灾 45 万亩庄稼被毁 17 万人逃离家园

8月中旬,洪水淹了豫中平原20多个县以后,进入淮河。由于河道较狭,障碍较多,洪水下

泄很慢。班台闸炸毁之后,为了抢救被洪水围困的河南200多万群众,中央指示安徽省委,淮河的行洪区必须立即排除一切阻水障碍,全部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必须立即破堤分洪、蓄洪,绝不能再加高加固围堤。可是,圩区的农民群众思想不通,阻力很大。因为这里没下雨,他们不相信会有那么大的洪水,许多农民自发的纷纷上堤看守。当时中共安徽省委派省委书记王光宇亲自带领有关部门领导,乘船前来现场检查督促贯彻中央的指示。我们在一条大船上见到了他们。王光宇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命令,动员各分洪区、蓄洪区里的群众紧急疏散,立即撤离,炸堤分洪。但是,群众没有一点点思想准备,工作十分难做,围堤一炸开,蓄洪区就成大湖泊,不仅长势喜人的秋庄稼全部被毁,区内所有粮食、牲畜、机器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都来不及挪走,只能是赤手空拳迅速逃到大堤上去,那时围堤外都是水了。我们在洪洼、蒙洼蓄洪区亲眼目睹围堤炸开时,围堤外的洪水涛涛流进圩内,圩区内群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纷纷逃向大堤的凄惨场面:他们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站在大堤上流泪,有的看着被淹没的家园放声大哭……的确,这一刹那间,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祈祷生命安全,在等待国家救济。

由于采取清除河道上阻水障碍,行洪区分洪,蓄洪区破圩蓄洪等措施,加速洪水下泄,河南200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得救了。

为了解救河南被洪水围困的200多万群众,破圩分洪,安徽沿淮地区农民无雨遭灾,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洪洼、蒙洼、邱家湖、姜家湖、南涧等地的分洪、蓄积,共淹没45.3万亩丰收在望的秋庄稼;有17.3万农民无家可归,一切物资财产全部被淹没。

六 唯有城西湖特殊

经过两天多的紧张破堤,淮河两岸所有的分洪区都分洪了,绝大部分蓄洪区都破堤蓄洪了,唯有城西湖特殊没有破堤,没有分洪蓄水。

城西湖位于霍邱县城西边,淮河干流南岸,是淮河中游最大的天然湖泊蓄洪区,常年蓄水区域面积为140平方公里(21万亩)。1951年治淮

时国家把城西湖列为淮河中游的重点湖泊蓄洪区之一,设计控制水位为26.5米,蓄水29.5亿立方米。这里不仅可以蓄洪、灌溉、养殖、航运,而且可以使淮北大堤、两淮煤矿、电厂及津浦铁路免遭水害。然而,1966年林彪批准南京军区围垦城西湖,并上报给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即“五七指示”。1966年10月成立围垦指挥部,动员10万民工建起百里围堤。从此原来最低洼的湖底,变成了军圩的“田”。围垦了城西湖最低洼的蓄水区110平方公里,使原来常年蓄水面积由140平方公里减到30平方公里。由于湖的容水量减少,把四周17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来水逼到高处,使原来沿湖旱涝保收的良田成了新的淹没区,当地群众意见很大。他们非常形象地说这是“围了锅底子,淹了锅台子”。每到雨季洪水上了“锅台”,进不了“锅底”,使圩外大面积农田受损。这次洪水到来,按说城西湖是应当破圩蓄洪的。但前来的指挥破堤泄洪的安徽省有关领导说:城西湖现在是部队的,是中央军委管的,是“五七指示”的发源地,不属省里管辖,我们无权决定,也没有这个任务。大家都觉得城西湖不应例外,但这样的意见没有人敢提。于是城西湖这个淮河边上的最大的蓄洪区没有破圩,没有蓄水,被保留下来了。

两年以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我曾两次随他到城西湖考察,群众对此反映很大,迫切要求退田还湖。但终因涉及到南京军区,以至中央军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直到1986年4月,新华社记者宣奉华到这里采访,写了一篇内参,报道了城西湖围垦造成的危害,以及群众的意见和迫切要求。此时当年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看到这篇内参,深有感触,十分重视,当天(4月14日)就在这篇内参批示中写到:“此地军队应全部撤

出,由地方处理。但从我亲自处理到紫阳同志去年亲自视察提出处理意见后,均未见效。时已几年,看来此事只有小平同志批示才行。特为民请命!”4月18日,邓小平同志作了明确批示:“请尚昆同志处理。围垦部队应尽快限期撤出。这些部队如无其他方法安置,都可做复员处理。”至此城西湖才停耕还湖,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欢迎。

发人深思的是:这么一件极不合理事情,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方向道路问题大加颂扬、大力推广,搞了整整20年,危害极大。1978年以后,省委以至国务院主要领导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多次提出意见,以至最后身为副总理的万里,竟然用了“为民请命”这样的词,邓小平表态作了批示,才算彻底解决。

七 究竟死了多少人

在完成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草稿后,纪登奎要我们重访灾区,写内参进一步反映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情况。我和国内内参组吴明华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来到河南、安徽沿旧路,从陆路重访灾区,在组织记者写上下



中央慰问团副团长、农林部部长沙风(右)在询问灾情

两本抗洪抢险专刊的同时,写了5篇《河南灾区纪行》内参国内动态清样。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关于水灾中死亡的人数问题》。这是我们此去河南灾区的重点调查内容,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现将这篇内参原文刊登如下:

新华社讯 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很清楚。但原来报的八万五千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三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四万人。

水灾发生时,人们对死亡人数估计得很多。原因是当时看到京广路以西的遂平、西平等县大部分被洪水洗劫一空,看不到人烟;京广路以东的十几个县在洪水包围之中,电讯中断。所以有人估计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八月十二日,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在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时说:全县四十六万七千人,初步统计死十六万人。八月二十日,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八万五千六百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所以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

这次记者在河南、安徽灾区访问中,又对人口死亡数字作了进一步了解。对这次水灾总的死亡人口数字,尽管说法不一,有的说三万,有的说四万,有的说五万,但总的看来,说死亡八万多的数字是多了。原因是有些群众被洪水冲走了,有的冲得很远得救了。得救后因洪水没有下去,就地暂时安置了一下。现在洪水下去了,交通恢复了,基本都回来了。

据记者了解,这次洪水死人最多的是驻马店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因洪水来时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加上抢救得及时,所以死人不多。周口地区死了五百多人,许昌地区死了三百一十四人。驻马店地区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垮坝,洪水来势猛,群众思想没有准备,所以死人较多。其中,板桥水库下游的遂平县死人最多,占死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是石漫滩水库下边舞阳工区的两个公社。因此,把遂平县死人的数字搞清楚了,整个灾区死人数字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而遂平县死人又都是集中在文城、阳丰、诸市等六七个公社。现在,遂平县各社

队上报给县里的数字是死亡两万二千多人;舞阳工区两个公社死亡二千多人。据我们典型调查和遂平县委的分析,遂平县死亡人口不止二万二千人,可能是两万五千到三万人。加上其他地区,这次水灾中总共死亡估计可能是三万多人,最多也不会超过四万人。

驻马店地委负责人分析,这次洪水死人可能是三到四万人。但他们不主张现在再逐个核实。原因是现在群众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一去核实死亡人口,又会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

八 水库为什么垮坝

河南、安徽这场大水,灾情重,死人多;死人多主要是因为两个大型水库垮坝。当时专家和权威人士们的普遍看法是:水库垮坝的原因是:雨量大,降雨时间集中,强调“连降特大暴雨,不到三天的时间,降雨量达800毫米以上,局部地方达1300多毫米,这么大这么集中的雨量水库承受不了。”一位水利方面权威人士在分析垮坝的同时说:除了雨量大,时间集中,水库垮坝还有个重要原因——水库的质量问题。这个水库是在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指示下,于50年代初期修建的。当时由于物资、技术条件所限,基本上是个用人工修建的土坝。

看来“降雨量大,水库质量差”,似乎成为权威人士和专家们共识;其实,并不尽然。随行有的专家就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他们不敢公开向水利方面的权威人士挑战。有的私下对我说:他们讲的这些是水库垮坝的原因,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全面,也可以说不是根本原因,是些表面现象。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年来治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应当肯定。但是,这次大水灾中也暴露

出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缺乏综合治理,特别是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 50 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 50 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 200 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熟悉这里情况的农林方面专家们认为,主要是森林和植被覆盖率的不同。慰问团有关领导认为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并指示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个书面材料来。

此后不久,由河南省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到这四大水库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并写出了一份《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交给了我,并转交给有关领导。这份材料用大量具体有力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回答了这四个大型水库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的根本原因。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记如下:

水库垮坝与上游的森林植被率有着密切关系。板桥、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共同点是: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树木很少,植被率很低,覆盖率仅占 20% 左右。除很少部分是新造的国有林外,所有的山地多是荒山秃岭,加之开荒、放牧、铲草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遇暴雨,山洪倾泻,泥沙俱下,造成水库淤积,库水混浊。年淤积厚度增高 13—20cm。1972 年雨水偏大,淤积竟达 35cm。因此库容不断减少。这次特大暴雨洪水猛下,水位暴涨,泄洪不及,致使大坝决口崩溃。

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的情况,与板桥、石漫滩水库情况截然不同。这两个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 90% 以上。群山苍翠,满山遍野像铺上一层大绿毯,蓄水保土能力强,年淤积仅 1.5cm 左右。每遇暴雨,森林和植被以及落叶和腐植土层,拦截了雨水,涵养了水源,减少

地表径流,延缓了雨水流进水库的时间,对保障大坝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如薄山水库流域面积为 575 平方公里,流域区内这次三天降雨量平均为 896 毫米,总降雨量约 5 亿立方米,加上原库存的 8000 立方米,共 5.8 亿立方米水。除去三天泄洪 4000 万立方米,仍有 5.4 亿立方米水要进入库内,而这个水库的最大库容为 4.3 亿立方米,如果全部雨水在短时间一齐倾入水库,势必造成大坝决口。但由于森林植被的吸收和缓冲,土壤的渗透涵养,减缓了地表径流,延缓了雨水入库时间,因而没有发生漫溢决口。这说明有 1.1 亿立方米雨水被森林植被截留在山上,从而保障了水库安全。

东风和板桥两座大型水库同在泌阳县境内,一个垮了(板桥水库);一个没垮(东风水库),这两座大型水库上游同样都修建了许多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这次降雨是同样差不多,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东风水库上游大部分是国营林场,森林植被覆盖率情况好,起到了水土保持作用,上游共有 90 个塘、堰、坝,被冲毁的只有三个,占 3.3%。板桥水库则大不一样了。由于上游多是荒山秃岭,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这次暴雨中上游 304 个塘、堰、坝,被冲毁了 129 个,占 42.1%。可见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重要作用。群众说:“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修堰不造林,全是白费工。”

1975 年 11 月初,我收到这份调查报告,立即转送给有关领导,但“石沉大海”,渺无音讯。80 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的确,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正是处于一场巨大政治风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烈斗争前夕,哪里还顾得上这种事情。

(责任编辑 吴 思)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 梁志远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并“卫星”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归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县各种农作物大放“卫星”。并组织力量找“卫星”,批判右倾创“卫星”,层层争先放“卫星”。亳县县委闻风而动,积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为抢先走在各兄弟县前头,在1958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大会上郑重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5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实现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即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的水田里,并在田埂上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的苦战,圆满完成了特大水稻“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亩产40803市斤水稻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这颗特大“卫星”的消息,省、地委迅速发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其他作物之风,迅速形成高潮,而放不出“卫星”的就是右倾。在秋收季节里,放出的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层层向上报喜的人群络绎不绝。到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丰收”的锣鼓和鞭炮的响声,全县谁也数不清放出了多少颗“卫星”。

在秋收后期,有的想争上游放“卫星”,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合放在一起,上报是很小面积的收获量。特别是春红芋(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芋挑拣分别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上报要求上级来人验收,以放特大“卫星”。这样报的多了,搞得县委也无法验收,有的交由公社验收,也有的不了了之。

县委所收的贴在竹木架上的喜报,在不长的时间内放满了档案馆几间库房,确实放不下了,才请示县委批准焚烧。

与此同时,《亳县报》和有线广播站,在一段时间里,天天有各地放“卫星”的消息。在诗画满墙化中,更是无奇不有,异想天开。从我亲眼看到而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的几幅墙画:一幅是,一块水稻“卫星田”的稻穗上有几个农民在行走,上角写着:“俺队的稻子不算好,社员能在稻穗上跑”。另一幅是,在县委大门口的墙上,画了一

个高大的玉米棒子，在靠近棒子的地方，画了比棒子矮小几倍的薛阁塔（亳县名胜古塔，亳州的象征，高约 50 米左右），地面上站着几个人仰望棒子的顶端，上角写着：“可夸可夸真可夸，玉米高过薛阁塔”。还有一幅是，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上装了小半截红芋，而大半截却在地上，画角上写着：“这个红芋不算大，一辆马车装不下”。

在秋收秋种田野里和一些现场会上，不仅红旗招展，而且插了很多标语牌。其豪言壮语和标语口号夸张得更为惊人。如：“一个冬瓜不算重，几头大牛拉不动”、“这颗蕨叶不算好，亳县烟厂用不了”……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再二再三地要人们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怎样高产再高产？

经过一阵狂热的浮夸，亳县在阜阳地区和全省的知名度大为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放亩产 4 万斤水稻“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在 1959 年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国务院的奖励。在农民生活普遍发生饥荒以后，当地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你也骗，他也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二）卫星汇集的出笼经过

秋收未过，县委为了显示 58 年“大跃进”的

成就，总结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的“经验”，决定由县农林局、科协、档案馆联合编写 1958 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一书。首先部署社队，由下而上在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筛选整理上报“经验”材料，由县里进行再筛选。全部材料分粮食、油料、经济作物三个部分，共选定 90 篇“卫星”“经验”，全书共 11 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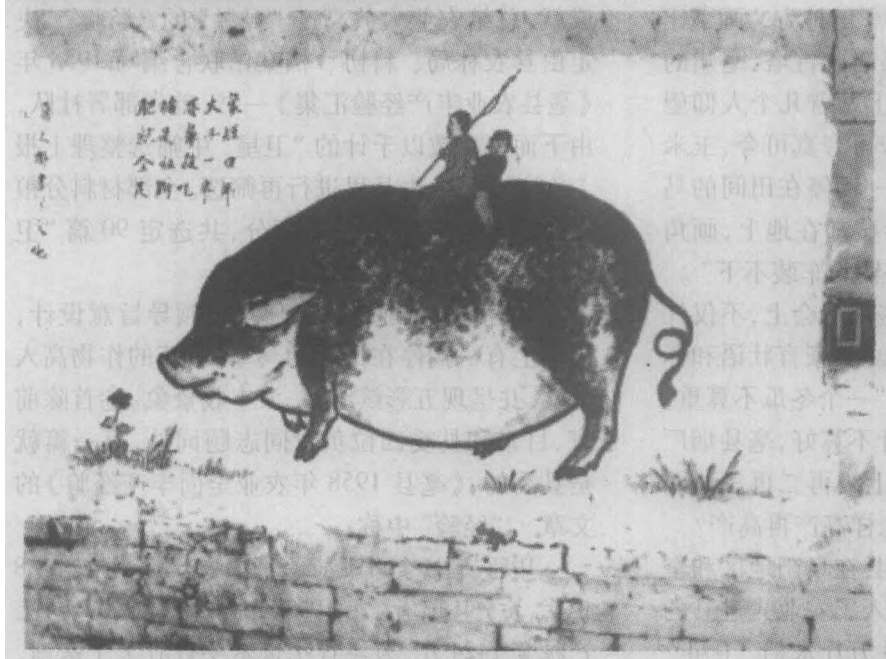
《汇集》封面请著名画家按领导旨意设计，封面上有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收获的作物高入云端，并呈现五彩缤纷，一派丰收景象。卷首除前言、目录和县委四位负责同志题词外，第一篇就是县委的《亳县 1958 年农业全面丰产经验》的文章。“经验”中称：

1958 年粮食作物面积 210 万亩，总产 10.8 亿斤，亩产 513 斤，比 1957 年提高 1.3 倍，人均生产粮食 1424 斤，为实行吃饭不要钱打下了基础，从而巩固了人民公社。油料作物占用面积 10.8 万亩，其中芝麻 7.7 万亩，总产 660 万斤，比 1957 年提高 77%。棉花 10.9 万亩，总产皮棉 650 万斤，是 1957 年总产的 3.1 倍。蕨叶 3.1 万亩，总产 790 万斤，比 1957 年总产提高 93%。全县农业生产一年超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这些产量指标，虽比原来初报浮夸产量下降多次，仍然是 1957 年产量的一倍以上。



《人民日报》有关农业“卫星”的报道



大跃进时期的壁画

文章中总结了全县的“丰产经验”，主要有五条：

第一，靠抓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向右倾保守思想开战。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从而破了“低产论”、“条件论”。并列举了大量的批判右倾保守典型的实例。

第二，依据农业丰产的实际，得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种在人收在人”和“无低产作物”的结论。

第三，党委书记挂帅，一切工作由书记出场，开展检查评比，召开现场会。

第四，实行全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第五，推广农业技术，大搞技术革新，创制改制各种农具，提高工效。

这五条“经验”的取得，代价惨重，不知全县有多少干部和群众，因怀疑“大跃进”和农业高产“卫星”而受到批判、斗争，戴上右倾帽子，当了“秋后算账派”，被拔了“白旗”，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在各社队的丰产“经验”《汇集》中选登的“卫星”，为表达真实，田亩一律计算到毫，产量一律计算到两。其“经验”基本上是与县委的五条“经验”一个模式。

以粮食作物为例：

水稻排在粮食之首。亳县本是麦豆旱粮地区，改种水稻，是安徽省委强制推行“淮北变江南”的“伟大战略”部署，亳县农民和国家财政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年实际亩产仅有300多斤。由于亩产水稻4万多斤的特大“卫星”为亳县增光加彩，另作专辑，《汇集》中只选登20篇亩产万斤以下的“卫星”“经验”。其中最高的亩产9197.5斤，最低的“卫星”亩产是2200多斤。亳县的水稻种植，到1961年中央纠正“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

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后，基本上停止种植。

红芋“卫星”经验，共选登10篇。其中产量最高的是位岗公社位岗大队第四生产队一亩鲜红芋产69368斤。而最低“卫星”亩产也在万斤以上。当年实际春红芋合计亩产仅有1000多斤。40年以后的今天亩产鲜红芋4000斤左右。

玉米“卫星”“经验”共选登7篇。产量最高的是十八里公社第一大队第八生产队一亩玉米产6875.5斤，这是公社党委负责人亲自掌握把十多亩品种相同的玉米合放在一亩地里放出的“卫星”，向县委报了喜。当年全县每亩平均实产仅150多斤。40年以后亩产仅800—1000斤。

谷子、秫秫（高粱），共选登27篇“卫星”“经验”。篇数多的原因，是1958年6月14日谭震林副总理来亳县视察，指示亳县要搞谷子、秫秫“挂帅”（高产）。指示发出以后，县委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向全县部署。要大搞谷子、秫秫“挂帅田”、“丰产田”。在坚决消灭三类苗的口号下，全县拔掉谷子、秫秫三类苗几万亩，造成了重大损失。这27篇“卫星”“经验”的选登，也是亳县县委对谭副总理的指示作了圆满的回报。“挂帅田”和“卫星田”的产量，谷子最高亩产3090斤，秫秫最高亩产2210斤，这两种作物当年实际亩产均在200斤上下。所放的“卫星”产量均系

并田浮夸。

在《汇集》部分稿件的审稿过程中,由于反右派刚告结束,我心有余悸,对稿件所报的高产,不敢有任何怀疑的表示。只能装糊涂,跟着吹,随着干,其产量数字斤两不少的全部放行。其他有不少人也与我心态相同,也是顺手而过。

据我记忆,原定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定稿,而实际是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过目定稿。

(三)放“卫星”的后果

“大跃进”中的狂热浮夸,冲昏了领导的头脑,殊不知凶神的报复来的那样神速。《汇集》定稿之日,已是全县农村饥荒之时。全县因无粮到1958年底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食堂因无粮多数停伙,农民因无粮而大批外流,浮肿等病已有发生。县委虽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大批“假象”、“西北风”,翻箱倒柜搜粮食,也无法扭转无粮局面。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事实真相,县委勉强承认无粮,安排了农村粮食回销,从而思想上稍冷了一些,至此,《汇集》就搁了下来。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同时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负责同志头脑又重新膨胀起来。1959年9月决定将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作为反右倾武器印发到生产队和县直部门,并上报省、地委。县委负责同志肯定了《汇集》是“大跃进”的标志,是1958年农业战线上伟大成就的总结。在全县反右倾运动中,凡是反映过1959年春季粮荒和农村饿、病等生活问题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地委春季来亳县的工作队中,有不少人因反映亳县粮食浮夸而受到批斗或处分。

经过1959年的春荒,《汇集》印发到农村以后,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没有人敢反对。某些领导,出于政治上反右倾的特殊需要,却对《汇集》如获至宝,拿起“武器”去批倒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的进攻,从而出现了种种以假整人的场面。如十九里分社薛菜园大队反右倾中批判老党员、老队长程中德否定1958年成绩时,有人竟拿着这本《汇集》说:“这能不是1958年成绩吗”?程明知这本书是假,也压着心中的怒火违心地说:“是成绩,是成绩……”

《汇集》真实地记录了亳县浮夸风的历史,成为一部地道的农业高产“卫星”史书,但对当时政治风云变幻和严重后果没有反映出来多少。从“大跃进”到“更大跃进”,从反右派到反右倾,《汇集》的印发,对浮夸风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顾历史,1958年粮食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其商品率达33.2%,从而造成了1959年的春荒。1959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而反右倾掀起了“更大跃进”,县委又大吹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林牧等业则增加几倍或十几倍。粮食高征购的商品率竟达39.5%,农民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57斤,除去种子、饲料和社办工业用粮,每天的人均口粮仅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年春最困难时人均每天口粮只有2两左右。这样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全县农村逃荒,饿、病、死连续普遍发生,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农民非正常死亡十分惊人。据官方公布,全县农村1958年底71万人,到1960年底死亡15万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万个农户家庭彻底毁灭,留下孤儿约5000余人。但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万间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现了大面积的荒地……

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省、地委派出大批工作队来亳县,帮助开展整风整社,落实了一系列的纠“左”措施,实事求是安排了农民的生活,到1961年春,亳县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 卢蒙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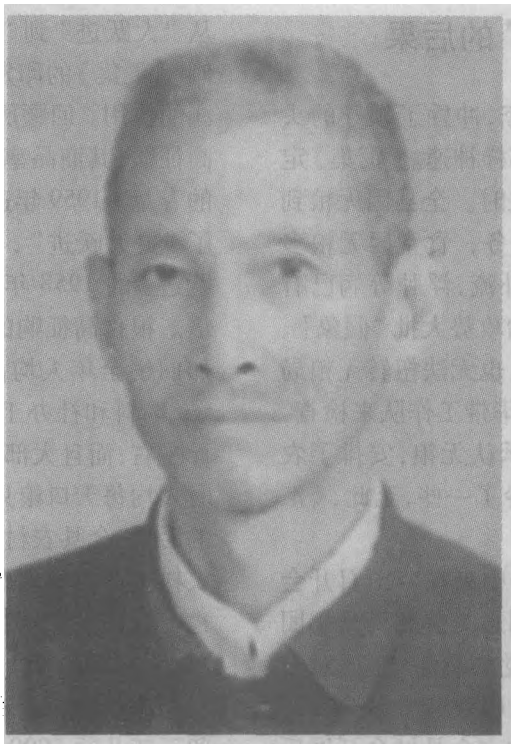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和江师范。1947年入我党领导的香港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师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里,察民疾,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



王 定

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3只木茹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

收工的时候,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连喊了几声“蒋××”,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脸肿得像南瓜一样大?!快点快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指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像一团棉

花,心惊肉跳,即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蚁、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报》总编辑(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在这个时候饿死的。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的体重 63 公斤,于今只剩 37 公斤。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 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好,由李的老婆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 1961 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自 1961 年以来,曾 8 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 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 1978 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成 1959 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孰视无睹就是好党员吗?!”

1979 年 2 月,组织上为王定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

达 21 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彻底平反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 1980 年的短文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戒〉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戒,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戒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戒的。”

1988 年环江事件 30 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已经 30 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飭《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1997 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 年 10 月 18 日,《南方周末》报于 18 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了王定的长文《狂热及其灾难》,从而向国人揭开了 40 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 100 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征的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错误路线的斗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 2000 年 7 月 26 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 77 岁。(责任编辑 吴思)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 雷 颐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 40 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谲波诡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闻一多

1912 年，年仅 13 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 年又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科学知识、文艺观念直到价值体系，无不深受其影响。

从考入清华到 1925 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在美国，虽曾与一些清

华同学创办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却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 1923 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1925 年 6 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融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的诗歌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

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他们沉醉在象牙塔之中的时候,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势中,闻一多只得举家返乡。然而家乡也不平静,北伐已经开始,湖北不久就成为两军鏖战之所。为了生计,闻一多又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但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时局没有平静过一天,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流血、屠杀、死亡……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闻一多再也难抑悲愤,像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不甚讲求修辞,但却充满火一般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却又是长久的沉寂。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徒有满腔热血的诗人又备感无奈,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不知何去何从,茫然无措……最终,他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心如止水,对世事过问无多而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二

从1927年夏到1946年夏被害止,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一而转为谨严深入的学者,将喷薄奔腾的诗情凝为冷静细密的考订,从“向外”的宣泄改为“向内”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转变,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变化。直到1943年秋参加“民主运动”之前,他一直过着避世的学者生活,甚至抗战初期避难云南时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

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

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取得如此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再三。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学术”尤其是传统“国学”,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而转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的学生、著名“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

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一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同样,胡适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蠢鱼,不晓得我是杀蠢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

三

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

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谄媚,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

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



抗战期间闻一多靠治印补贴日用

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人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只脚”。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

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

四

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但是，每个人的转变又都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因素。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

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从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却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吴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

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

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走笔至此，则不能不令人顿生万般感慨：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华岗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捕入狱，“文革”中更是备受磨难，于1972年瘐死狱中，直到1980年始获“平反”，只可惜斯人已去；罗隆基在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于1965年在孤寂中病逝；谁也没有料到，1965年秋对吴晗的批判竟成为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的序幕，吴晗与妻子袁震在1969年双双被迫害致死，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也惨遭迫害而精神失常，只得以死相抗，在1976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2岁的年轻的生命……

面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一种殉道般的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那遥远的少年时代读过的高尔基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竟如此鲜明地涌跳出来，字字如重锤击胸，使人喘不过气来：“要是人们都不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也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日军何以不侵占澳门

● 张 娟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侵略成性的日军又挥戈南下，相继占领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而独对澳门始终未予侵占，这是为什么？数十年来，对此问题世人论说甚少，现将我所知道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叙述如下。

南美洲的巴西地处热带，幅员辽阔，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土地肥沃，而人口稀少。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在1822年已宣告独立，但在政治、经济上仍然深受葡萄牙的影响。当时巴西国内除了土著居民数百万外，葡国的移民也只有五六百万，因而巴西地广人稀，许多地方几乎都是未开发的地域，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大大限制了其发展。

为此，在19世纪末叶，巴西曾派员来中国，与当时的清政府商谈，希望人口众多的中国向巴西移民。

当时，中国人向往的是富庶繁华的欧美诸国，而不是偏远的、荒凉贫瘠的南美洲，故都不愿离乡背井；而昏庸的清政府又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向外移民有损大清皇朝的威仪，所以断然拒绝了巴西政府的建议。

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巴西又转向日本政府，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移民条约。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陆续向巴西移民已超过300万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已宣布为中立国的葡萄牙深知日本的扩张野心，十分担心日军会占领澳门，便假手巴西向日本政府照会：“如果日本侵犯澳门，则巴西必将定居巴西的数百万日侨全部遣返回国。”所以，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虽然近在咫尺的澳门唾手可得，却始终不敢染指，这也是葡日双方为了各自利益而通过秘密外交手段达成的默契。

毛泽东弟媳庞淑谊的平民生活

● 非 可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他的堂弟兄们当中排行老三,因此他的乳名为“石三伢子”。这些毛家弟兄共有十位。这十位弟兄,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大都为人们所熟悉,而其中的一位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后来改名为毛运才、毛万才)。解放后,毛泽东的这位不善言谈的堂弟和他的妻子庞淑谊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东北。在几十年的艰苦的生活中,他们的周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世。1981年,毛万才在抚顺去世。

此后,作为一名百姓,毛万才的妻子和她的子女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抚顺这个北方的工业城市,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近日,记者在抚顺市新抚区一处普通的职工住宅中,找到了今年已80岁的庞淑谊。

八岁那年,她嫁给了15岁的毛泽青

1930年庞淑谊8岁,父母多病,家中没有一分耕地,一间常常漏雨的小茅房就算一家人仅有的一点家产。忙时候,父母拖着多病的身子给别人做活,挣点粮食吃,而闲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得出去要饭。

当时,在韶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有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为了保存韶山的革命力量,为了不被国民党抓走,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与毛泽民不得不“假离婚”。这个时候,王淑兰就寄住在毛慰生家。

毛慰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同一祖父,家

里只有三间草房。和庞淑谊家里一样,毛慰生家里也没有地种,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给别人做长工糊口。毛慰生先后共有三个孩子:男孩毛泽连、毛泽青,女孩毛泽建。因为毛慰生家里很穷,又因毛顺生家里没有女孩,毛泽建就被过继到毛顺生家。

住在毛慰生家中的王淑兰很关心这家人的生活,她常常帮助毛慰生的妻子做一些零碎的家务活,有时候还为毛泽连、毛泽青兄弟俩带回一点吃的。这些,让兄弟俩一直不能忘怀。一天,王淑兰对毛慰生夫妻俩说:“看庞月池(庞淑谊的父亲)家很苦的,他家的女娃子很懂事,给泽青做媳妇吧。”毛慰生夫妻当即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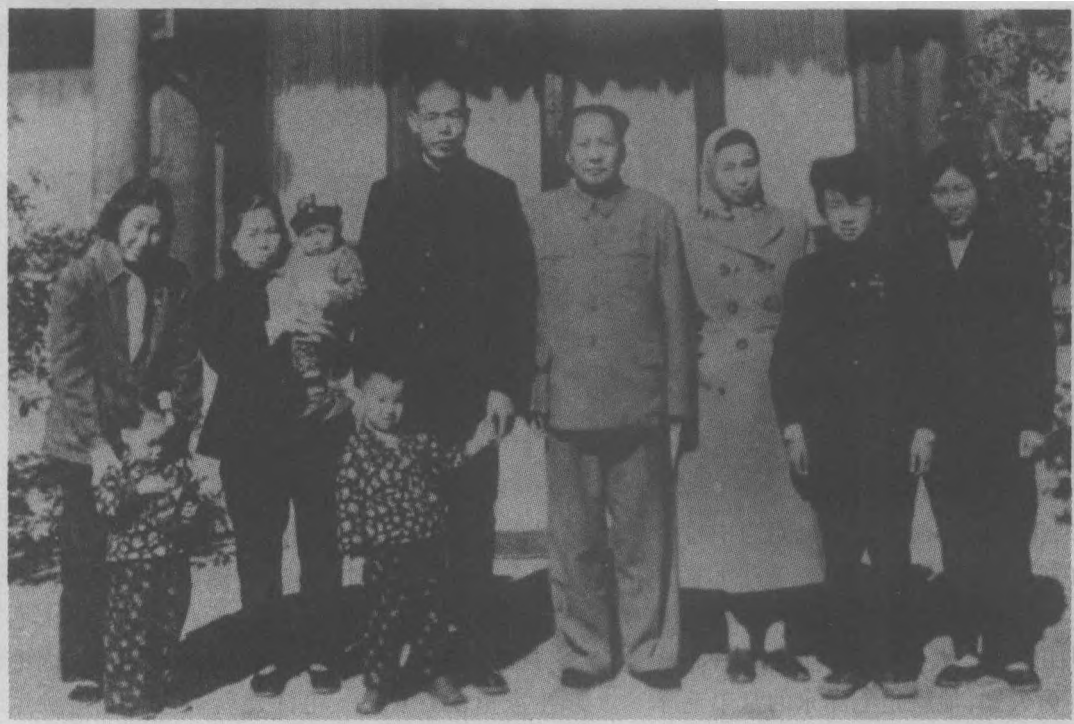
第二天,王淑兰来到庞家说媒。庞淑谊的父母觉得毛家人都很诚实可靠,便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很快,庞淑谊出嫁到了毛家,做了毛泽青的童养媳。那一年她八岁,毛泽青15岁。

她丈夫20岁那年,投奔延安的三哥

来到毛家后,庞淑谊有时和毛泽青一起在别人家里做一些农活,有时则帮助婆婆做一些家务。在毛家,她的生活要稍好一些,因为这时她不再出去要饭了。

在庞淑谊的眼里,毛泽青老实厚道,言语不多却很真诚。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毛泽青总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关心、爱护着她,舍不得让她多干一点活。婆婆很爱唠嗑,有时不免要对儿媳妇讲起



左起：李敏、庞淑谊、毛泽青、毛泽东、江青、毛远新、李讷

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事情。有一次，她说：“三伢子从小就爱帮助别人。有一回下雨了，庄稼都在地里晾着，他帮助穷人把庄稼收起来，这让毛顺生很生气，就骂他。三伢子却顶撞说，人家穷，庄稼少，咱家庄稼多。”

这时，毛泽青已长到20岁，他的个头已经早已高过了自己的家门。人们说，韶山还没有过这么高个子的人。后来据他的子女讲，他的个头足有一米九五。

毛泽青从小就对三哥毛泽东充满着敬意。在他的心中，一直向往着革命，向往着能跟着这位一直走革命道路的三哥为穷人打天下。他想，有这份热情，有这么高的个头，参加革命能用得上劲。

他开始向革命组织靠近。这一年，他在王淑兰的秘密工作下，离开韶山，投奔延安，投奔毛泽东。

为了保证家里人的安全，免遭敌人的迫害，毛泽青对他们保守这一秘密。临走的时候，他对庞淑谊说：“我要出去做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在家好好过吧。……”

毛泽青这一走，再也没有任何音信。庞淑谊和她的公公、婆婆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更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从此，庞淑谊身上的负担更重了。没有地种，她只好和家里人一起到外面给人家做长工。因为那个时候土地比较集中，许多人都“地无一垌”，所以打长工的人很多，做工换回来的粮食少得可怜，

有时都难以糊口。

庞淑谊以她的勤劳和诚挚，和毛泽连夫妻一起，料理着公公、婆婆的生活，支撑着这家人艰苦的日子。尽管她显得有些瘦小，但她却总主动承担更多的劳务，这使得她与公婆和妯娌相处的很好。一家人在韶山相依为命，等待着毛泽青的归来。

就这样，庞淑谊在韶山一直等了12年。

1949年，湘潭地区解放。这年9月，一位解放军捎来了口信：“毛泽青早就参加了革命，如今是后勤部队里的一个副连职干部，现在长沙，过一段要回家里来看看并接走妻子。”

12年的漫长的等待，12年日日夜夜的企盼，庞淑谊终于盼到了丈夫的音信。惊喜之中，她和家里人等不到毛泽青回来，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

毛泽东是她丈夫参军和入党的介绍人

几天后，在长沙戡子桥附近的一处军营里，庞淑谊终于找到了高高的个子、身穿军装的丈夫毛泽青。

此时的毛泽青，已32岁，比他离开韶山时更

高了,而最明显的,还是他比在家时胖了一些;而庞淑谊,多年的劳累和困苦使她变得有些憔悴,站在高大的毛泽青面前,就更显得有些瘦弱了。

毛泽青对妻子说:“革命不成功,我就不能回来。三哥毛主席介绍我参军又介绍我入党。”

原来,12年前,毛泽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来到了延安,找到了日盼夜盼的三哥。看到十弟毛泽青来投奔革命,毛泽东很高兴,他一一问了几位韶山老人的情况,还特意问到了毛泽青的亲哥毛泽连(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寄钱救济他)。他对十弟说:“来了就好嘛。”当他们谈到毛泽建等亲人的惨死,都很悲痛。毛泽东对十弟说:“泽青,要记住啊,我们可不能想升官发财啊,要为穷人打江山。”

从参军到入党,毛泽青的介绍人都是毛泽东。不久,毛泽东还送给他一支枪,并说:“干革命没有武器不行,武器是啥,就是革命理论和枪杆子。”

毛泽青在抗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在部队里搞后勤工作,后来他又到山西为了革命搞了一段地下工作,为了保密身份,他改名为毛运才(解放后又改名为毛万才)。

有人建议将她丈夫的名字改回叫“毛泽青”,她反对,并给他改名叫毛万才

几天后,庞淑谊和丈夫回到了韶山。庞淑谊发现,当丈夫看到解放后的韶山充满了生机,贫苦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竟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对庞淑谊说:“跟着毛主席干了12年革命,就是盼着今天啊。”

半个月后,庞淑谊跟着丈夫回到了部队。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连职干部可以让家属随军。这样,庞淑谊就跟着丈夫和部队一起走南闯北,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分开。

刚开始,他们在长沙,后来就到了四川南充。又过了一年,他们又随部队到了东北佳木斯。这段时间,毛运才一直在部队里搞财务工作。

庞淑谊,一直在家里带孩子,并料理着所有其它的家务。她常常对丈夫说:“毛主席早就对你说过,不要想升官发财,在部队里要注意呀。”

毛运才说:“我一定不给三哥抹黑。”

毛运才老实厚道,在部队里从不讲起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4年,庞淑谊的丈夫毛运才转业到辽宁阜新发电厂。转业前,一位干部在家里对他们说:“要转业了,你们要是听我的话,毛大哥再用原来毛泽青的名字更好,用毛运才这个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大哥是毛主席的堂弟,别说你们不说,就是说了也没人信。”

这位好心的干部刚走,庞淑谊对丈夫说:“运才,这名字可不能往回改,咱们要的就是不让别人知道我们和毛主席的关系。要改也可以,毛运才这个名字用家乡的话说不大上口,就改成毛万才吧。不管咋说,不能再叫毛泽青。”

丈夫听了庞淑谊的话,到了阜新发电厂后,取名“毛万才”。

三哥在中南海约见庞淑谊全家,两家人合了影

到了东北后,庞淑谊的丈夫毛万才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地方和家里的情况。1955年,毛泽东给他们回了一封用毛笔写的信:“泽青弟:来信收悉,一切尚好,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东。”这封信现仍由庞淑谊保留在家中。

庞淑谊和丈夫一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他们的三哥毛泽东。他们几次写信都向三哥表达这个心愿。1956年11月,他们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让他们全家来北京一次。庞淑谊和丈夫激动得一夜未睡。

夫妻俩领着三个孩子来到北京。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家人被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在那里约见了他们。

在毛泽东的家里,庞淑谊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红光满面、正领导着亿万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此前,她曾想了千言万语,但此刻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当丈夫向三哥介绍妻子和孩子时,毛泽东对她说:“东北那里很冷啊,你能习惯吗?”庞淑谊说:“早就习惯了。”

毛泽东向江青介绍说:“这是叔叔家的儿子,十弟泽青,就是在延安当兵的那个,这是弟媳,也是韶山的,这是他们的三个孩子。”

毛泽东将一个玩具车送给了庞淑谊的二女儿，江青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不是那天少先队员送给你的吗？”毛泽东说：“那今天我作主，把这个礼物送给小侄女。”

闲谈间，毛泽东让江青把几个孩子叫进来。很快，庞淑谊一家人见到了李敏、李讷和十几岁的毛远新。毛泽东请他们吃了一顿饭，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湖南菜。毛泽东说：“吃点家乡的菜吧。”

饭后，毛泽东说：“咱们合个影，留个纪念。”这样，毛泽东、江青、李敏、李讷、毛远新与毛万才一家人在餐厅前合了影。后来，这张照片他们一直珍藏在家中，40多年从没有公开过。

临走时，毛泽东给了他们300元钱，让一家人回了一趟韶山老家。

毛泽东去抚顺视察要见他们，但却没能见到

回到东北后，庞淑谊对丈夫说：“见到毛主席的事，就不要对别人讲了，平平常常地最好，免得人家说咱们骄傲。”毛万才说：“那就跟谁也不说了，好好工作就啥都有了。”

后来，庞淑谊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抚顺。毛万才在抚顺市政公司做党委副书记。

1958年8月，毛泽东到抚顺视察，表示要见一见他们。因为保密的原因，市委的同志事先让他们第二天去机关一趟。但到了第二天，他们却因孩子生病而没有去。两天后，他们才知道是毛泽东要见他们，可这时毛泽东早已离开抚顺。两个人急哭了。

“大跃进”时，人们“干劲冲天”，许多年轻夫妇看不过来孩子。这时，一向在家里相夫教子的庞淑谊和几个女同志一起，在抚顺市开办了一个幼儿园，为人们义务看孩子，一直坚持了三年多。

那时候，除了管档案的同志和她丈夫的上级领导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世。

后来幼儿园解散，庞淑谊又回到家里。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那时候，庞淑谊已有了五个孩子，一家人只住在一间房里，几个孩子要在搭起的上下铺睡，

十分拥挤。家里只有丈夫一个人挣工资，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她却从来不让丈夫向单位要救济。她劝说丈夫：“比咱们家困难的还有的是，孩子大了后，慢慢就会好了。”

生活的重负早就使丈夫得了心脏病，卫生所的一个医生和毛万才是至交，对他们夫妻说：“就凭你们的身世，竟弄得这么困难，找找组织。”庞淑谊说：“困难啥，比起我小时候要饭，还不强上百倍？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早就被饿死了。到啥时候，咱们也不能麻烦组织。”

“文革”时，她劝说丈夫不要加入任何“武斗”的派别，直到1970年，她和家人才住上两室的房子

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抚顺各种派别林立，他们“文攻武卫”，闹得不可开交。

庞淑谊知道丈夫老实厚道，平时从不跟别人闹意见，计较什么，遇到事常常憨厚地一笑了之。他性格内向，待人诚恳，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在“武斗”之风盛行的时候，庞淑谊真的有些担心了。她天天劝说丈夫：“老毛，外面这么乱，你可千万别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去武斗啊！”丈夫总下保证：“放心，我不去乱闹。咱干不了大事，也不能给三哥抹黑。”

那时候，有两个派的头目了解到了庞淑谊和她丈夫的身世，便先后悄悄地找到他们，让他们加入自己的派别，以壮大其声势。但是，不管来人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答应。

1970年，庞淑谊一家仍住着一间房，孩子渐渐大了，家里就更显得拥挤不堪。这时，那个卫生所的医生看不过，在庞淑谊和丈夫不知道的情况下，找到了市里的军代表，他说：“老毛（万才）干革命这么多年，五个孩子都大了，还住一间房子！”不久，他们才住上两室的房子。

丈夫去世后，为了生活，她为居委会扫了三年的街道，每天挣一元钱

1974年秋，庞淑谊和丈夫想回湖南韶山探亲，事先写信给毛泽东，想先去看望他。不久，总

理办公室来信,让他们到北京来,准备去中南海见毛泽东。但他们在北京等了几天后,被告之原计划因故取消。后来他们才知道,毛泽东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没能再见到他的堂弟和弟媳。

不久,毛万才退休。退休之后,庞淑谊和他常常去新抚区菜市场做义务劳动。这种活动他们一直坚持了两年多,直到后来毛万才的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才作罢。

1981年,毛万才去世。

此后,因为一直没有工作,儿女们的收入也非常低,庞淑谊的生活便没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她与当地居委会联系,和几个老太太一起打扫街道卫生,她们一人负责一片,春夏扫脏物,秋天扫树叶,冬天扫雪。每天早早地起来,拿着扫帚沿着街道清扫。没有人知道,她自己也从不讲起,她就是毛泽东的十弟媳。

儿女们心疼,不让她去。她笑着说:“就算锻炼身体了,起得早,干点活儿,身板也结实。这不挺好嘛。”

当时,居委会一天给她一元钱的报酬。这样,她一直坚持到了1984年。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庞淑谊又一次回到了韶山。在家乡,她见到了李敏、李讷、韶华、毛远新、毛新宇、毛远平(毛泽连之子,现为韶山接待处负责人)等毛家亲人。他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十婆”。

她总对子女说:“要像你爸那样,什么时候也不要给毛主席抹黑啊。”

也是在1993年,抚顺市财政局局长郭峰在飞机上看到了一篇写毛泽连的文章,里面讲到了



庞淑谊近照

他的弟弟毛万才一家一直很清贫生活在抚顺。他真的有些不相信,毛泽东的堂弟竟也生活在抚顺这个城市。回来后他就四处查寻。两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庞淑谊老人。他发现,老人生活的很拮据,这位局长的眼睛湿润了。

他要发动干部为老人捐款,老人坚决不允。庞淑谊的五个子女除了她的大女儿毛小平在机关做服务工作收入稍好外,其余人收入都很低,生活都很困难。

庞淑谊的两个儿子全在企业工作,厂里效益都不好,看到这种情况,这位很有社会良心的局长在不让庞淑谊老人知道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对她的大儿子毛佳新进行了人事考核。考核合格后,将他从厂里调到市财政局工作。

她的二儿子毛佳明十几年前从部队退伍后,一直在一个小厂里工作,近年来他所在的企业效益较差,很多时候都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即使发了工资,也是很少。

几年前在韶山探亲时,有人对十婆庞淑谊说,你们要在湖南,子女的境遇会好很多很多。她却说:“在哪儿都一样。”

尽管生活得不算太好,但她常常告诫子女们:“要像你爸那样,什么时候也不要给毛主席抹黑啊。”

(责任编辑 吴思)

丁文江的治军梦

● 吴小龙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有趣现象：文人治军。其最早的出色代表，就是曾国藩。他以一介书生，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鏖战，虽然也数次几乎全军覆没，但他屡仆屡起，屡败屡战，终于成大业。说他有满腔文韬武略，似乎并不尽然；但他的治军思想，却让军校出身的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曾国藩的治军语录，终日置诸案头，不断分赠给他的黄埔弟子。后来表现出了比蒋介石更高明得多的文韬武略的毛泽东，早年亦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个从不要枪的文人，试看其指挥三大战役一段，亦何等痛快淋漓，“完满无缺”，可以算是文人治军的极致了。当然这些都是政治领袖型的人物；至于纯粹的文人，在这世局动荡、群雄并起的百余年间，立志投笔从戎的也不少，像项羽那样要“学万人敌”，研究军事学，当军事家的也有——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当成了军事家的蒋百里，和终于未当成军事家的丁文江。

丁文江以科学家闻名，是我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开创者。他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和北大地质系，为培养我国地质人才，开展我国自己的地质调查

和研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又堪称是一个全才：他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所做的许多调查研究为我国填补了空白，具有开拓意义；他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志》在短短的几年里办成了世界一流的科学期刊；他又是一个出色的学术行政领导者，长于组织领导学术研究的开展，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以思想家的身份发起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讨论：科玄论战，弘扬了科学理性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还积极关心政治，干预政局，除了与胡适等人创办杂志，发表文章评论时政之外，还曾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职务（相当于上海市长），后来大上海的规模，即于此奠定在他手中。这充分表现出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的才能。傅斯年因此对丁文江有着极高的评价，说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精华”，而且誉之为“治世之能臣”。

然而，这位生于乱世的“治世之能臣”，终其一生，却有一个独特的心愿没有实现，那就是办一个一流军校。丁文江在军事学领域的研究和造诣是长久来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科学家、思想家、纯粹

的文人，居然在军事方面颇有研究，这在今天看来不免令人惊异。其实，这正好反映了我在前面所说的在近代中国的特定情势下文人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军事方面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 20 年代初，他在经营北票煤矿（在当时的热河朝阳县）的时候，由于经常到东北，并结识了张学良，丁文江就开始研究奉系军队的内幕和奉军的军事组织。他认为直皖战争之后很可能会出现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因此，自己不能对中国可能出现的灾难和政治事变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他的一个准确预见。在直、奉军阀各自加紧扩军备战的时候，山海关内外战云密布。这时，丁文江通过与军界朋友的接触和对来自战场的官兵的直接采访、询问，了解和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据此在《努力》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军事评论，如：《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奉直两军的形势》和《奉直战争真相》等，表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军阀各派系军事实力和中国当时的军事格局与形势的详尽而充分的了解。他的好友蒋廷黻曾这样评论他：“关于这些题目（军阀方面），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军阀个人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的高低、教育的程度、生

活的习惯、彼此的关系、部队的数量、素质、配备等,在君几乎是无不知的。就是当时日本的专业军事密探都不能比在君知道的更多或更正确。”丁文江后来又写成了一部专著《民国军事近纪》,表述了他对军事问题的独到见解。他的这些论著,均以“宗淹”为笔名,表达了他对北宋诗人、曾统兵镇守边境的“儒将”范仲淹的钦佩和景仰。一个军界以外的文人能够对于军事问题发表有价值的评论,甚至作出准确的预见,这是一件颇令人惊异的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中,就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如丁文江和后来的羊枣、乔冠华等即是。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而丁文江在军事方面的宏愿和雄心,还不止于这些文章论著,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为中国办一所高级军官学校。丁文江最早是在1925年向孙传芳这位当时看来还颇有些励精图治气象的“五省联帅”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时孙传芳在杭州,而丁文江等受江苏各界之托,去请孙出兵援救江苏,驱逐奉系军阀。孙作为交换条件,要丁文江答应为他帮忙,他问丁,“奉军赶出江苏之后,肯不肯来帮帮我的忙?你在哪一方面可以帮我最多的忙?”丁文江回答道,“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我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的校长。”他对孙说:“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学校,

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20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它高等教育至少落后20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这位“全才”,居然不以自己在地质调查所或“淞沪总办”任上的出色业绩自得,而认为自己更能够胜任的工作是军校校长,他对自己在军事学方面的能力的估计是否过于自信了?历史并没有给他一个验证的机会。

丁文江要办军校的心愿,除了他对中国军事教育落后状况的忧虑外,还包含着他对中国军事将领总体素质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军事首领之中,不少人都具有指挥的天才,爱国的热忱,坚强的毅力,但因缺乏现代的知识 and 训练,往往不够担任国家危难时期的艰巨责任。”他对当时中国的重要军事人物的评价与我们今天显然不同,这一方面,我相信,由于丁文江与那些人有着不少直接的个人接触,他的评价自有其一定道理。但是,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想以现代知识和观念去影响和改造那些人的意图,势必是要落空的。对于办军校,丁文江还认真地作了不少具体设想:他认为好的军校也必须有第一流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学科课程,使军人具有现代学识。他还认为好的高等军事学校教员的选择必须采取严格的学术标准:学生

的选择必须采取严格的入学考试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要废除保送制。这些观点,丁文江不但对孙传芳说,后来也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说过——但是似乎没有人听他的。在他们看来,像丁文江这样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书生要当军校校长,简直就是笑话。更重要的是,在旧中国,军队是新、旧军阀们的命根子,培养军官更是他们培植派系的重要手段,与这种政治利益的要求和考虑比起来,现代学识、学术标准,简直就是极可笑的事。孙传芳听了以后就对丁文江的建议报以哈哈大笑,当他在说笑话,并且对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忍请教你。”作为大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对军事教育当然“还懂得一点”,但这恐怕并不是丁文江所渴望、所企求的现代学识、现代思想观念,而是丁文江所厌恶的政治和权术考虑。后来的国民党“总裁”也一样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军校“校长”的头衔。丁文江想当军校校长,想为中国办一所好的高等军事学校的愿望,终于不能实现。而那位当成了“军校校长”的蒋百里,在任上所做的最为惊天动地的事,竟是当着全体学生的面,举枪自杀。在那个尴尬时代中“文人治军”的悲凄,已是无以言说。那令千载文人神往不已的“投笔从戎”之梦,终于彻底成为翻过去了的一页。激励着中国文人千年之久的从戎戍边、指挥千军的浪漫情怀的终结,是不是有些让人怅惘的意味?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反省

● 牛 钊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

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紧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



蒋介石登机去台湾

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析,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

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

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

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当蒋

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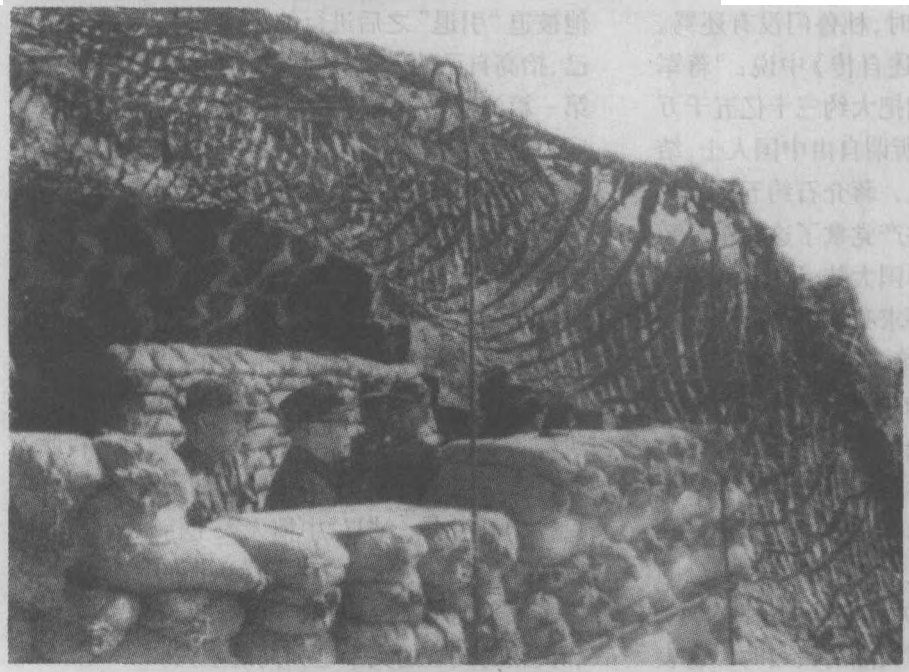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

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究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蒋介石(戴礼帽者)在金门遥望大陆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

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

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马歇尔的看法是：“共产党之军队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而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余相信共产党军队能于八个月至十个月期间内，全部被歼。”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而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将于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灭，或被驱入深远之区域内。”蒋介石好像是有意给美国佬露一手。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气壮如牛。他宣称：“天下无不可打破的计划，无不可制服的武器，无不可消灭的敌人。我平生治军作战，我的心目中就没有敌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作我们革命军人的敌人。我们不作革命军人则已，作了革命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不许敌人存在。”他

说：“共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空虚到了极点，他尽管自我宣传，说有多少兵力，有怎样坚强的民众组织，其实完全是虚声恫吓。”他说：“敌军都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只是虚伪欺骗，夸大宣传，玩弄些小花样，以眩惑耳目。”自负与轻敌，乃兵家之大忌。撇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谈，单从军事观点来讲，这种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已显示了对形势判断的根本错误。而蒋介石正是在这种自我迷信的神话中，开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内战初期，解放军战略防卫，国军颇占优势，曾取得所谓“三大胜利”。一是逼迫江苏的新四军转退到山东，这使蒋介石大喜。他说：“现在第一收复区的敌人已失败北上，但一定还有不少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二是在华北攻占了张家口，这使蒋介石喜上加喜，立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更严辞拒绝了各方面有关和谈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这使蒋介石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并亲率文武僚属前往视察。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接着便是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25万（蒋军55万，解放军70万），经过52天激烈战斗，蒋军损兵折将，退出东北。平津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67万（蒋军57万，解放军100余万），经过58天战斗，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40万（蒋军80万，解放军60万），经过65天鏖战，蒋军全线崩溃，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战争形势的逆转，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战争进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点奇怪：“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更有点惶惶然：“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

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蒋介石已是焦头烂额，信心尽丧。他哀叹自己“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不过他还是“幸存”了。他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烂摊子丢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虽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并未收敛，反共的豪言壮语并未消歇。就在解放军挥师渡江、攻占南京时，蒋介石对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训示道：“渡江是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产党暴露的最大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他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此时此地，就是他的心腹爱将，恐怕也不会相信这种梦幻呓语了。

就这样，蒋介石以他的顽固的反共态度，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带上了穷途末路；把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数百万大军，引向毁灭的深渊。作为始作俑者，他有无愧疚呢？没有。当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言，则又天君泰然矣。”数十万大军饥寒交迫，死伤遍野，而其最高统帅竟能无愧无怍，“天君泰然”，这种态度已由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天君”肯定不怎么“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态度依然故我。以这种态度进行的反省、检讨、总结等，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维呢？不过，当他在指责“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时，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 吴永平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与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胜利会师了。此时,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党中央率先召开这次文艺盛会,显示了新政权对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

与会的文艺界代表824人,可以说,除了极个别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稍有点儿名气的作家都得到了邀请。然而,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的姚雪垠却不在其列。显然,这不是出于一般的原因。

几十年后,有位作家在回忆录中透露,当年姚雪垠搅进了一桩“公案”,“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相?这堪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笔者钻进图书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拣,“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结果发现,这桩“公案”与20世纪40年代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默杀”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读者透露出姚雪垠已遭“清算”的消息: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

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

那时,有哪个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郭沫若、茅盾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国共两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甚至有人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再版三次,销行数万册。如今抗战刚刚“惨胜”,其创作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这变化真让人弄不明白。

“清算”运动并不是中华文协组织的,而是文协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决定清算姚雪垠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自某种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缓而峻的过程。

1943年以前,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没有碰撞的机会。

姚雪垠1943年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胡风的只有一篇《谈论争》(1940年),是探讨新文学运动历次论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在谈及“默杀”这一战术时,他提到胡风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1942年8月,姚雪垠在《〈创作论初集〉后记》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风的文风,批评他“不肯通俗化”。

胡风在此前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姚雪垠的名字,但这并不是说,胡风没有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尤其是颇负盛名的《差半车麦秸》。作为抗战文协的理论部负责人,胡风有责任关注抗战文坛上的新动向,评价与推荐佳作。他确实这样做,但他绕开了姚雪垠的作品。

姚雪垠并不知道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已经牵涉到文坛上的历史恩怨,更不知道一场风暴将要来临,直到胡风“清算”的大棒打到了头上,才恍然大悟胡风当年的态度正是他熟知

的论争战术——“默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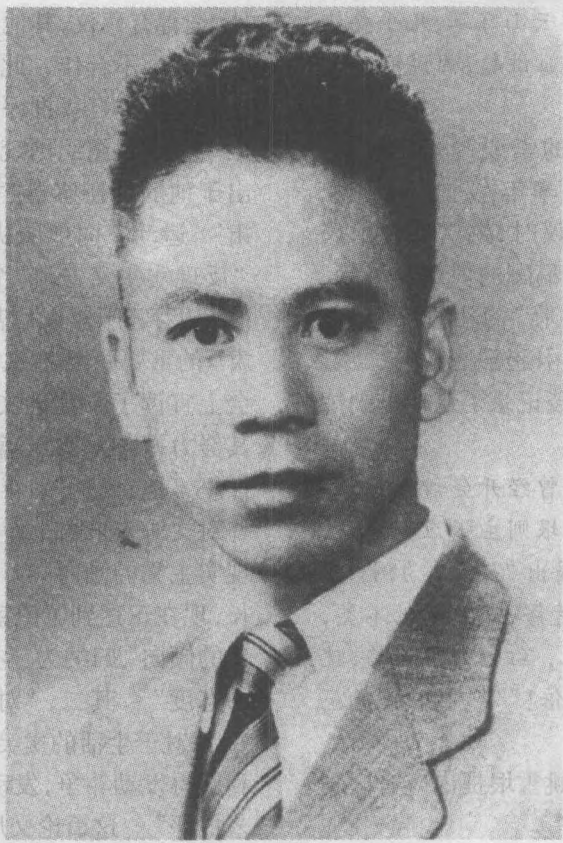
“天才”

1938年底至1942年年底,姚雪垠一直在第五战区体验生活。《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胡风从未去过战区,抗战初期他曾宽容地赞扬过那些战区作家,说他们是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1939年)。抗战中期,他却这样写道:“战争初期,有些作家忽然到了前线,又忽然跑回后方,不几天又跑上前线,……他们是把上前线去当作从前的进咖啡馆了。这样的作家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战争作品来。”(1942年)

姚雪垠并不是胡风所指的“忽然”作家,他在抗日前线呆了四年之久,直到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才来到大后方,受到抗战文艺界的欢迎,国共两党的报刊都争着发表他的文章。当年,文协改选,姚雪垠当选理事并任理论部副部长。胡风时任理论部部长,两人成为同事。奇怪的是,我们在姚胡二人的回忆录中找不到关于此段经历的片言只语。联想到胡风此时对战区作家的轻蔑态度,姚雪垠受到胡风等的冷遇,也不足为怪的。

姚雪垠性格耿直,郁积心中的对胡风等批评家“默杀”态度的不满,日久自然也会流露。1943年初,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批评》的文章:“目前文坛上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好的作品没人提到,没人注意,往往使有前程的作者在悠长而艰辛的旅途上感到寂寞,甚至也许会感到疲倦。”



姚雪垠(摄于1948年)

党的文艺工作者弥补了姚雪垠的遗憾,安慰了姚雪垠的“寂寞”。这一年里,《新华日报》组织了三篇文章,称赞姚雪垠为“最肯花费匠心来使用中国大众语文的作家”,“在文学语言创造上,有了灿烂的新成就”。可见,至少在这一年,中共文艺核心对姚雪垠是充分信任和肯定的。

姚雪垠任职文协期间,是否与胡风有过冲突,这里不敢臆测。他曾在文协“辞年恳谈会”上宣读过一份年度工作报告,题目叫《论目前小说的创作》(1944年初),高度评价了抗战小说界的现状:

今日要期望早一点有天才出现,就必须给天才以成长条件;要期望早一天有伟大作品,就必须给伟大作品的出现以便利。

胡风主持会议,对姚雪垠的总结未置一词。早在1942年底,他便认为抗战文坛到了“逆流”期,而姚雪垠的评价却相反;姚雪垠在报告中为天才所进行的呼吁,更引起他心中的反感。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天才》(1944年9月)的杂文,对姚雪垠加以嘲讽:“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对于敌人,这不算是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文中虽未点名道姓,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陈纪滢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写过姚雪垠的“天才”表现: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写作技巧’,又与《易

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罩,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挖苦的索要高价的“天才”,却另有故事。1943年下半年,文协联合作家呼吁提高稿费,据说开会商议时,姚雪垠曾附议尊重出版界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附议也传出去了,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于是谣诼随之而来。作家孙陵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则传闻不太可信。但姚雪垠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

“整肃”

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整风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和风细雨。

姚雪垠参加了“读书小组”,经受了批评。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萝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地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

胡风也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他在《再返重庆》中写道:“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

外,记得有蔡仪,其他人就不清楚了。”由于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此后他便与读书小组无缘,更没有进行过自我批评。

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出于他的责任感,独立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他总结了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归纳为三类:其一,“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其二,“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其三,“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胡风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他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姚雪垠和碧野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石怀池把他们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批评他们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排色恋爱故事”。更有甚者,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其后,众多蜂拥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排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激起了文坛强烈的反弹情绪,茅盾率先指出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

候》“毛病主要不在内容而在结构上”，而且越写越好，“第二、三分册——特别第三分册——在小鸟啾啾之中有金戈铁马之声，甚至不妨说金戈铁马之声终于成为基本的音调了。”

第一轮攻势受挫，胡风并不灰心。1944年底，《希望》创刊，他又推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论主观》等论文，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这种煞有介事的姿态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等纷纷提出质疑。

正在领导国统区整风运动的中共文艺领导也警觉到胡风对整风运动的干扰，1945年年初，冯乃超组织了两次会议，与胡风讨论关于“客观主义”及《论主观》问题，胡风“没有被说服”。问题闹到周恩来那里，集体会议与单独谈话双管齐下，胡风仍然不服，但私下里却调整了斗争策略。他在给路翎的信中写道：

书评，好的。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我不愿意说，不管他们口头上的恭维，在文坛上，我们是绝对孤立的。到今天为止，官方保持着沉默。而近半年来，官方是以争取巴、曹为最大的事。这一发表，就大有陷于许褚战法的可能，让金圣叹之流做眉批冷笑当然无所谓，怕还会弄出别的问题。——恐怕管兄又已引起一些官僚在切齿了。所以，暂找别的典型的的东西罢。《戎马恋》、《幼年》都可以，可能时，望赶写一两则来。

此信的写作时间正处在冯乃超与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之间。胡风可以无惧于“绝对孤立”的处境，但他不能不顾及党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胡风决定对战术目标作微小的调整，饶过巴金和曹禺，重点打击姚雪垠等。

“小偷”与“色情”

在胡风的授意下，打击范围从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逐渐扩大到《差半车麦秸》。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指出新的攻击点：

信、稿都收到。能弄两三则书评么？或者把春暖花开先生追击一下，赏给他一点分析。但这得追到什么《半车》去，那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

主义，而且是从《八月的乡村》偷来的。（1945年6月12日）

路翎马上动笔，写成《市侩主义的路线》，化名未民，赶在《希望》第3期发表。他极力演绎胡风信中所指出的要点，毫不顾及论证之荒谬。为了证明《半车》是从萧军那里“偷”来的，他说萧军笔下有个喜欢“吸烟袋”的农民，而姚雪垠笔下的农民也喜欢“吸烟袋”，这不是“偷”是什么？为了证明姚雪垠的作品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路翎挖苦地说政坛号召“描写农民的转变”，姚便创作《差半车麦秸》；政坛又号召表现“抗战与进步”，姚便创作《戎马恋》和《春暖花开的时候》。路翎质问：这不是“投机主义”又是什么？

路翎鄙视姚雪垠，还因为他从《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看到了“色情描写”，他从小说中摘录了下面这段文字：

假如把罗兰比做李商隐的诗，把小林比做达文西的画，从王淑芬的身上就不容易使我们感觉到艺术趣味。不过当少女们刚刚发育成熟，纵然生得不美，只要不过分丑，对青年男性都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量。何况王淑芬同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懒洋洋的，半睁不睁，带着三分睡意，二分媚态，自然也相当的能招人爱。

从此，胡风派便派定姚雪垠为“色情作家”。

“硬骨头”

1944年底，姚雪垠写了一篇随感，题目叫《硬骨头》，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是对胡风等的攻击的回应。

姚雪垠的确有一把“硬骨头”，胡风等的批评，如果说对他有所刺激，也不在那些吓人的政治大帽子，而是对他的创作能力和潜力的轻视。路翎曾嘲笑他笔下的农民形象雷同。于是，姚雪垠放下了未完成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创作《长夜》，他要证明给路翎看，他还能写出具有新的性格的豫西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夜》是姚雪垠的“发愤之作”。

胡风等对姚雪垠等作家的“清算”，激起了

强烈的不满情绪,进步文坛议论纷纷,国民党袖手旁观。中共文艺领导觉得进步文坛打内战,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派乔冠华居中调解,却遭胡风的拒绝。胡风在回忆录中写到:

“我看他(指乔冠华)还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例如,他对姚雪垠是抱有好感的(我当时没有设想过姚雪垠是共产党员),向我提过打算约姚雪垠一道谈谈文艺问题,但我没有回答他,还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了尖锐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等于给他吃了闭门羹。(胡风《文稿三篇》)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文艺评论家,胡风在理论的坚持和一贯性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他在实施文艺批评时注重于评估批评对象的“人事关系”,并以此来决定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批评的力度,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后来,他之所以放弃对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的批评,重点打击姚雪垠等,也是出自“人事关系”的考虑。却不料,姚雪垠骨头太硬,胡风欲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

流言

1945年年底,重庆文艺界突然传出流言,说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作家孙陵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

有一次,他忽然一定要留下来,要和我作彻夜长谈。我便留他住下来。那次谈话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始终苦恼着他的特务问题。他很忿慨地说:“从立煌回到重庆,周恩来请咱吃饭,当然是看得起咱。后来不知为什么,忽然开始打击,连我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稿子,那个刊物到新华日报去登广告。结果广告登出来了,咱写的文章连题目带名字,却一笔勾掉了。既然收了广告费,为何可以随便改动别人的广告?这本来是可以打官司的。”“你为何不告发呢?”我问道。他却说:“我到新华日报找徐冰,质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徐冰说:‘听说你是特务!’当时我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桩飞来横祸对姚雪垠的情绪有很大影响。11月,姚雪垠在一篇文章写道:

我的唯一的武器是一枝笔,我的最高希望是

做释迦牟尼,而不是当强盗“杀人放火”。我希望人们不要以猜疑的眼睛看我……那种猜疑的眼睛我害怕,那种离奇的谣言我害怕,所以单为着我的文学事业,让我也大呼着要民主,求自由!(《自省小记》)

流言是从延安抢救运动中传出来的,当年陕北抓特务成风,不堪刑讯的人便乱攀乱咬,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姚雪垠1946年5月出川,途经重庆,曾面见徐冰要求澄清,徐冰当然知道姚雪垠不是特务,但他也没有澄清的责任。

胡风当然知道这个流言,他不会放过再一次痛击姚雪垠的机会。胡风回到了上海,继续重庆未完成的“清算”工作。清算运动再起高潮。

1946年3月,《联合特刊》发表《骑士的坠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这个刊物是左派刊物的大本营。远在广州的《文艺生活》发表《评姚雪垠的〈出山〉》,质疑姚雪垠在战区的表现;《文艺新闻》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姚雪垠,其中最令人不堪卒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姚雪垠“机会主义的本质”。

挑战

1947年初,姚雪垠带着《长夜》和《记卢谿轩》的书稿,从河南来到上海,这两部作品是他反击胡风派的武器。上海是战后的文化中心,姚雪垠想在这里重振旗鼓。就在这时,“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伸出了援手,不但为他提供住处,而且答应给他出选集。刘以鬯是后来的香港著名作家,他开的这家出版社定名“怀正”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与“蒋中正”没有关系。此后一年多,姚雪垠就住在出版社,安心写作。很快,《雪垠创作集》共四种顺利出版。姚雪垠在《雪垠创作集》的跋中,把几年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古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继这个集子之后,我还有许多作品将陆续的,一部一部地拿出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

由呼吸的朋友摆播。

这篇文章又名《论胡风的宗派主义》，载北平《雪风》第3期。据笔者所知，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公开地系统地批评胡风派宗派主义的第一篇文章。

姚雪垠的挑战，引起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1947年9月）。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寄给胡风。胡风9月22日给阿垅的回信中写道：

信和论四则都收到了。信，刚才斟酌了一下，日内和另一文同时发出，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当然，还可以在别的地方爆发的。——这么一来，他底生活关系完全弄清楚了。

请注意信中“公案”二字，姚雪垠当年的“公案”到此处已揭开谜底；还请注意“生活关系”四字，当年指的是党派关系。胡风信中赞同阿垅在文章中暗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且让我们从阿垅文章中摘引两段：

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

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的歇斯底里，就是他“刻画”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穷窘”。

不需要再加注释，此时，胡风等人已认定“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已认定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

从一桩“莫须有”的流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雪垠危殆冤哉。

两面夹攻

上海滩胡、姚“内战”正酣，却不料香港正酝



胡风 1948 年在香港

酿着一场风暴，那里聚集着一批有组织的文化人，他们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以“清算”回击“清算”，彻底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编辑班子里都是当年重庆党的文艺领导，如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

我们特别注意到胡绳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两篇文艺批评，一篇批评胡风最赞赏的作家路翎；另一篇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刊物最有分量的文艺评论。

胡绳在丛刊第一辑中批评路

翎：“一面批判着知识分子，一面又用浮夸的自欺来迷糊知识分子真正向前进的道路”；但他在丛刊第二辑中更严厉地批评了姚雪垠，他认为《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春暖花开的时候》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而《长夜》则充斥着“地主少爷的‘浪漫’情调”。

胡绳是姚雪垠的老朋友，交往甚密，他不但了解《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创作过程，这部小说最初也是在他主编的刊物《读书月报》上连载的。胡绳如此严厉地批评姚雪垠，其中不无自我批评或自我洗刷的因素存在。胡绳批评路、姚，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在胡绳等已接受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人们心中，“内战”双方的理论与创作都是要不得的，他们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

在这些执有“新式武器”的对手面前，胡风难以招架，他觉得“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1948年末，胡风极不情愿地离开上海，从香港绕道华北。

被抛弃的姚雪垠留在上海，欣喜地聆听着解放军越来越近的炮声。

幸与不幸

抗战后期,胡风所发动的“整肃”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严重地伤害了姚雪垠等进步作家;更暴露出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偏颇之处。他对姚雪垠等的清算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

从1949年到1954年,党和政府给予胡风相

当高的政治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华东文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却没有一个实职。而姚雪垠只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上海大夏大学兼职教授,代理文学学院院长并兼任副教务长,后调回河南文联当专业创作员——没有一个虚衔。

此刻的胡风是幸运的,姚雪垠是不幸的。然而,幸运的人有幸运人的烦恼,不幸运的人有不幸运人的追求。幸与不幸,天知道?(原文5万字,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 吴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李锐论说文选	李 锐	28.00	4.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方 实 杨兆麟	25.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 晓 丁 东 徐友渔	26.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老三届朝歌——尘劫	丁小禾	22.8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我向总理说实话》本书作者自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改革的全过程。他于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如实反映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等状况。此信引起中央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曾赴监利县调查。书中不仅记述了这段经历与感受,还对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今年10月出版。李铁映、李德生等为该书的出版题了词。胡绳写了书名。

温济泽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本书辑录了温老的战友、同事、学生和亲人等写的文章61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缅怀了温老坎坷而光辉的一生,赞扬了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同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温老的学术思想,对研究中国新闻史、广播史和新闻教学理论等具有参考价值,有些资料还是鲜为人知、十分珍贵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 安晓意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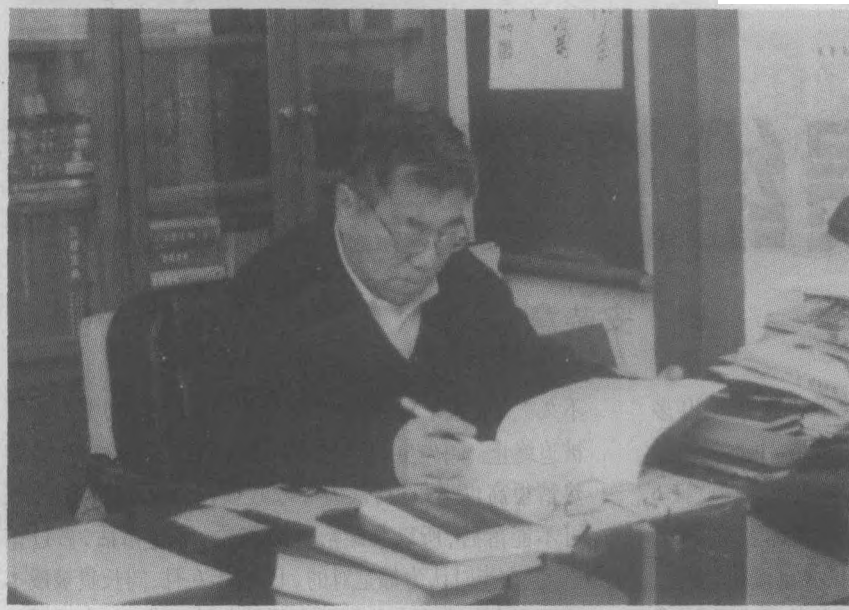
阎长贵先生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由于解放，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先生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阎先生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阎先生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这时的阎长贵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同时也迈进了一扇日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委、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



阎长贵近照

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带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20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你都不再接受（阎感觉到，江青显然看出了这件事是别人让他做的），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从这件事以后，阎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江青曾对阎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所以，阎每天

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阎先生说：“唯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所以我既没坐过专列，也没坐过专机。”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给人们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没有为难过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从没有

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别人告诉阎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阎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动过窝儿！”阎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前几天，阎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没有看完，

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在1975年给阎长贵的结论中,就因这封信而定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这位小字辈也在劫难逃,阎长贵的厄运从此开始。

事有凑巧,当时比阎稍晚些时候和阎共同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录父亲病危,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一星期后回来,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对阎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从钓鱼台11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随身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悬一线的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年后,阎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写到:“若问原因?我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阎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

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地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呵,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阎先生保存至今的这本当年林彪赠送的《毛选》,封皮已经翻卷,破得几乎拿不起来了。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先生说:8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尽管猜不出他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阎先生,处处予以关照。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先生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中学校长,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先生于1979年9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当我问阎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他脱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了。但是,为什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怎样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而现在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实在是不应该的。”

(责任编辑 吴思)

《白毛女》从延安进北平

● 丁 帆

为昨天还在敌对、而今天已经成为团结对象的朋友演出,这确是一场很不平常的演出。

1949年春节,是个不平凡的春节。由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同进行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0多万人,北平和平解放,并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

2月2日晚,我们华北大学文工一团,正在长辛店待命排练节目,团长舒强同志忽然接到北平军管会指示,要我团连夜进北平,准备开展城市军管与宣传工作。贾克同志带来两辆大卡车,车辆厂又派来一辆大车送我们,大家兴高采烈地跳上汽车,经过卢沟桥进彰仪门到市内,街上路灯早亮了,行人很少,不时看到穿大衣的巡警。车到北池子草厂胡同12号停下来,我们下车走进一个大房间,打开背包睡在乱草上,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

2月3日,我军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式,上午10时开始。我们与华北大学文工二团和华北人民文工团合在一起整队到前门欢迎我们自己的队伍,四周汇成红旗的海洋。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美国炮车和坦克的摩托声,与前进的军乐声、歌声、欢呼口号声交织在一起,荡漾在北平上空,声势浩大。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高举红旗敲着锣鼓,在道路两旁热烈欢呼。一位北平市民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同志啊!多少年我们北平市民没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刚开过,我团便接到军管会要我们为傅作义起义部队师级以上军官演出歌剧《白毛女》的通知。这是《白毛女》进入北平后的首场演出,也是一场极特殊的演出,

二

歌剧《白毛女》诞生于1945年。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产生一批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负伤》等小秧歌剧和《血泪仇》、《惯匪周子山》等大型秧歌剧。《白毛女》这部划时代的民族新歌剧,就是在秧歌运动蓬勃兴起的基础上创作出的成功佳作。

记得1945年5月底6月初,为了迎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白毛女》要进行首场演出。当时,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已于1942年精兵简政时整编了,首演任务便由鲁艺师生来完成。演出阵容比较强大:剧本是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作曲:马可、张鲁、瞿维等。王滨、王大化、舒强导演。演员:喜儿由王昆、林白扮演,张守维演杨白劳,赵起扬演赵大叔,邸力演王大婶,陈强演黄世仁,王家乙演穆仁智,李波演黄母,韩冰演张二婶,张成中演大春,这是第一代演出《白毛女》的主要演员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这次在党校礼堂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代表们的一致好评。当戏演至高潮,大春、大锁追赶“白毛仙姑”到山洞,终于认出是喜儿并把她救出时,主席感动得流泪,台上歌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主席激动地和大家一起起立鼓掌,那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按周副主席的话说:“你们走到了时间的前

面……”意思是民族矛盾将是次要的,阶级矛盾将要变得突出。不久,他去重庆,在向战斗在国统区的同志们讲述观看《白毛女》的激动心情时说:“在重庆看再好的戏,也无法与看《白毛女》时那种感人程度相比,因为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真正写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命运和斗争。”

三

给“七大”演出后不久的同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然而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决定延安鲁艺要迁往东北办学,还分别组成华北、东北两个文艺工作团奔赴新区开展革命文艺宣传活动。9月中旬,华北联合大学从阜平迁往于8月23日刚解放的河北重镇张家口市,进行复校与扩大招生工作,以华北文艺工作团作为恢复联大文艺学院的基础,这时,华北文工团在进行复校工作的同时和抗敌剧社联系共同组织排练演出从延安带来的《白毛女》,当然演员阵容要有些改变。

首先是导演,还是在延安时担任导演的舒强;喜儿仍由王昆扮演,凌子风演杨白劳,张非演赵大叔,高维进演王大婶,车毅演张二婶,孙铮演黄母,黄世仁仍由陈强扮演,吴坚演王大春,穆仁智由叶扬扮演。

本来在分配角色时,喜儿一角田华也是被选之一,因为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她的老家河北。后终因她太年轻刚17岁,怕她完不成任务,便分配她做场记,成天跟着排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要将歌剧《白毛女》改编搬上银幕,她才从无数个被初选的喜儿中脱颖而出。从此,不仅歌剧《白毛女》走遍了全国也到了国外,电影《白毛女》更走遍了全世界,这是后话。

当时,《白毛女》在人民剧场(原张家口剧场)连续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反映强烈,创造了三天演出6场的最高纪录,轰动了整个张家口,成了街头巷尾人们的热门话题。一直演到2月中旬,因抗敌剧社另有任务,尽管各阶层市民一再请求续演,也只好停了下来。这中间华北联大文工团又恢复成立起来,成员除抗敌剧社演职员外,就是

参加这次演出《白毛女》所有人员,团长是吕骥(后为周巍峙),副团长是周巍峙、张庚。划归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领导。

1946年8月,联大文工团和文艺学院部分师生到东线怀来地区参加土改和慰问部队,演出《白毛女》,后又转赴西线到大同前线郊区进行“踢土”演出(即没有电灯只有汽灯,没有扩音器只凭嗓子说、唱、喊,挖坑埋杆子挂一道浅蓝色或白色布幕,就是天幕,前面简单培个土台子就是舞台,上千战士坐在背包上看演出,演员在“舞台”上踢着土演戏而得名)。此后,《白毛女》便成为华北联大文工团主要演出剧目之一。

另外值得书写一笔的,也算是个插曲,就是当时在张家口新新戏院演出山西梆子的晋剧名角郭兰英,看了《白毛女》后,所表现出来的新奇、惊喜与激动,几次流泪不能自己,她觉得这哪儿是看戏,明明演的是自己,台上的黄母、黄世仁不就是师娘,穆仁智就是师娘的管家贾仁太……联想自己从小家贫6岁开始学戏,13岁被卖到戏班子上,贫困饥饿、血和泪伴随着童年。现在还不满17岁,便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与侮辱,对照台上的喜儿和歌词里唱的:“永辈子的受苦人,今天要翻身!”不正是说我吗?虽然张家口解放了,自己仍然生活在带有封建行帮色彩的旧戏班子里,依然被奴役剥削,没有真正的自由,要想混个人样,就得参加革命,要想演戏,就要扮喜儿那样的角儿。

同年10月,当国民党傅作义几个骑兵师从张北奇袭张家口,我军暂时作战略转移,华北联合大学跨过平汉铁路撤退到河北冀中束鹿县大、小李家庄等地,在文工团到达广陵时,郭兰英和她母亲在抗敌剧社王久晨、何迟同志帮助下,从后面追赶上来,要求参加革命。开始到抗敌剧社,因为是部队不太合适,经过组织批准加入联大文工团,换上套翻领蓝布制服,成了一名革命文艺战士。领导上非常关心她的学习生活,特安排贾克教她文化,请舒强教她表演,张鲁、胡斌教她识谱等音乐课……郭兰英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迈进了她崭新的生活。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为恢复城市建设开展宣传工作,文工团决定演出《白毛女》,郭兰英被分配为喜儿C角,终于实现了她的宿愿,整天像只自由的鸟儿一样高兴。只是由于她的

文化水平读台词有一定困难,这就靠王昆来帮助了。再加上喜儿B角孟于这位“革命大姐”,她们三个喜儿在一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彼此切磋的机会多了,对排练大有裨益。特别是舒强在排练中对郭兰英在传统戏曲的大量唱法,身段、舞蹈、表演中加以选择、提炼、融合进来,使《白毛女》更加民族化、艺术化、大众化,在演出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舒强和郭兰英对中国民族歌剧的一大贡献。

黄世仁这个角色,本来由陈强扮演,由于他怕给人留下坏印象,在延安时他拒演停排,剧组不得不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反复学习《讲话》,联系自己受到启发,终于打通了思想,成功地将恶霸地主的丑恶嘴脸和残酷剥削欺压农民的罪行展现在观众面前。正因如此,在演出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险些真的被“枪毙”了。记得在东线怀来演到最后一场戏斗争黄世仁,随着台上演员高呼“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台下突然飞来无数野果子,一个野果子把他的眼睛打成了“乌眼青”,好长时间才恢复正常。另一次最惊险的是到河间为部队演出,他们正演到开诉苦大会,一个新战士在看戏中忘了是演戏,愤怒地把子弹推上膛,举枪对准舞台上的黄世仁,亏得班长发现的快,赶忙按住枪,避免了一场意外大事故。从那以后部队再看演出《白毛女》,领导上规定一律不准带武器。

谈起《白毛女》的艺术魅力,在国外也有不少故事。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演出《白毛女》,到演出结束谢幕时,一位年轻姑娘手捧一束鲜花走上台正要献给陈强,观众席中有位老人突然大吼一声:“不要给坏蛋献花!”看来无论什么时候,中外观众都一样爱憎分明。

到石家庄后陈强却不能演黄世仁了。因为联大文工团到冀中束鹿不久,陈强便去找沙可夫院长提出请求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去工作,开始院长不同意也舍不得他离开文工团,他便去找老校长成仿吾诉说理由,还流下眼泪,直到老校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才破涕为笑兴高采烈地去了东影,这样黄世仁一角便由吴坚来扮演了。

此后《白毛女》的歌声,便在解放后的石家庄、正定、冀中平原……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在祖国城乡飘扬。一些工人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加强了爱厂护厂建厂活动,积极加紧生产支援解放军

解放全中国;一些农民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很快掀起土地革命,敢于向地主讨还血债投入反霸斗争;一些部队指战员看了《白毛女》演出后,高呼为杨白劳、喜儿报仇而冲锋向前奋勇战斗;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我是看了歌剧《白毛女》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很多情况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那场面实在感人。回忆起当时杨成武将军看了《白毛女》以后说:“解放军打到哪里,你们《白毛女》演到哪里,《白毛女》真成了刺刀尖上的文艺。”

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1949年间,解放军部队师以上文工团(队)演出《白毛女》平均每月15场以上,观众数以千万计,还有几十万俘虏的官兵。记得在1948年5、6月,在夏衍同志的积极倡导支持下,由香港建国剧社、中原剧艺社、新音乐社联合于九龙普庆大戏院演出《白毛女》,排队买票的观众把戏院围了几圈,可见香港同胞也是异常热爱《白毛女》的。

四

这次《白毛女》进入北平后的首场演出,的确不一般,虽然演员阵容没大变化,但舞台大了,观众不同,一切正规化了。比如群众演员增多了,乐队扩大了,舞台上增加平台还有高台……经过连日紧张突击排练,到2月16日晚,终于在西长安街国民大戏院(现首都电影院)正式演出了。由著名演员金山报幕,一开始他向观众介绍了华北大文工团与《白毛女》,接着拉开大幕。“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这带有民族和浓厚北方乡土气息的歌声回荡在刚解放的北平人民舞台上,整个舞台上下,包括剧场内外都分外安静严肃。演出前有人在戏院门前想看看海报,都被军管会工作人员劝说走了。主要因今晚来看戏的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将领们,面对这些特殊的观众,更增添了大家的好奇感,几十天前,他们还在为蒋介石卖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不知他们今晚观看控诉旧社会的《白毛女》该有何感想?当我场上没戏时,我带着一种好奇心,从舞台侧幕扒条小缝偷偷仔细观察他们的反应。

舞台上的戏在进行着,场内安静极了,既无人走动也没人交头接耳,静得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声响,偶尔听到一两声轻微的咳嗽和抽鼻子声,主要声音都来自台上。王大婶在音乐伴奏声中上场了,今天是由邸力演出,她是在延安第一代扮演《白毛女》中王大婶的老演员了。艺术经验丰富,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血肉鲜活惟妙惟肖。每次演出她一出场,就那双踏着音乐节奏的脚走起路来便可获得满堂彩,等到对杨白劳和喜儿说完“看你们爷儿俩,这还能让到外人家去!”之后的咯咯一笑,可真叫绝了,就更会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每逢至此,所有看戏的观众也包括我们同行的演员们,莫不被她这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所折服。可今晚,她同往常一样出场,而且精神集中得多,不仅没有满堂彩,连一个鼓掌的也没有!舞台监督慌了,后台主任慌了,演员们也都沉不住气了,惊奇地在相互嘀咕着:“怎回事!?出事故了?!”都捏着把汗……

我凝神屏气在侧幕后,眼睛瞪得滴溜圆,看着台下一个个陌生而严肃的面孔,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泥塑似的,我想可能在来剧场前,他们长官一定训话了,规定了纪律,才使得他们大都在控制约束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戏剧的感染力终究不是可以靠理智来主宰的。当戏进行到一幕四场,杨白劳被恶霸地主黄世仁强迫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卖掉亲生女儿悲愤服毒身亡,穆仁智强拉喜儿抵债,在这威逼生死离别的苦难关头……台下观众席中开始出现了一片唏嘘声,有的人不自觉地用手帕擦眼泪,有的低下头在抽泣着,还有的在干咳,已不是轻轻地……整个剧场沉浸在一片悲愤气氛中,他们的内心受到冲击,感情受到震撼。后台总算稳定下来,我们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像战士冲锋陷阵一样,在攻占最后一个碉堡,直至落幕,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告诉我们胜利了,谢幕时的喜悦与欣慰是无法言表的。据戏院工作人员讲这次演出《白毛女》的剧场效果是前所未有的,太难得了。

观看这次演出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邵力子先生回到宾馆连连称赞:“这是一台不可多得的好戏!”当夜久久不能入眠。金山和张瑞芳也到后台来了,他们的激动和热情自不必说,一再赞扬演的太好了,实在让人感叹兴奋,因都是同行,共同



本文作者丁帆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大锁(摄于1950年)

语言多,大家一直谈着笑着,还夸奖前民的杨白劳很有功底。

当我们离开戏院已是深夜,戏院门前还有一些观众在等待着演员们出来见上一面,其中有从西郊赶来的大学生,他们一再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公演?可见人们期盼《白毛女》早日与观众见面的急迫心情。

在不长的时间里《白毛女》公演了近40场,场场爆满,观众非常踊跃。后因文工团另有任务,要参加华大三部(即文艺学院)的教学工作而停演了。很多观众来信,有的找上门来要求续演,大学生反映最强烈,特别是有的看过《白毛女》后便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唱着《白毛女》的歌声渡过长江,也有个别同学立志从事人民戏剧事业。有的同志直到今天仍为歌剧艺术发展繁荣而奋斗。

回顾歌剧《白毛女》,从它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到进入北平走上大舞台,从解放区的“踢土”演出走上世界舞台的这一光辉历程,可以说《白毛女》像号角一样,在唤起民众觉醒,为翻身自由和为民族解放奋起而斗争。

(责任编辑 致 中)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经过

● 窦应泰

一 口述历史的缘起

韦慕庭教授(C·MARTIN WIPUR)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主要策划人和发起者。可惜的是,就在张学良这部包罗万象的口述资料面世的前夕,这位年逾九旬的美国学者,已经先于张学良走完他人生的漫漫长途。韦慕庭并没有见到口述历史解密的那一天。

1991年夏天,张学良结束在台湾半个世纪的幽禁后,来美国纽约探亲访友,在蒙特普里仁特镇拜见了他在青年时期在沈阳结识的朋友韦慕庭。韦慕庭生于1901年,与张学良同庚。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1918年秋天,韦慕庭就随他父亲远涉重洋,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东北。那时候,东北三省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主政时期。韦慕庭从那时起就与刚刚18岁的张少帅结识于东北奉天(沈阳)。他们一见如故,曾共同赴北大操场观看阅兵,分手时少帅又赠送中国书画若干幅给韦慕庭。

张学良首次访美时,韦慕庭已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他在晚年居住的蒙特普里仁特镇,与阔别多年的张学良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见。张那时尚能拄杖行走,而韦慕庭却以轮椅代步了。他们这次会面不仅圆了两位异国友人的旧梦,也引发了治学严谨、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韦慕庭大胆的设想——支持张之丙的建议,抓紧时间对张学良进行历史口述工作!

曾经在哥大主持历史口述工作的韦慕庭所以突发奇想,是在那次小镇午餐会上,张学良即席提出个让韦慕庭感兴趣的要求,他想和哥大一些年轻留学生,座谈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张学良

特别希望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韦慕庭深感张学良的到来,是哥大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马上对张之丙(哥大东亚文学系资深教授)和洛克斯两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前奏,你们一定要让张将军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他的头脑就是一个封闭半个多世纪的史料仓库。这个仓库里的宝贝价值连城,如果我们谁能开启他的记忆闸门,谁就能得到难以估量的宝贝!”

张学良去“哥大”的座谈会如期举行。然而张学良对这次座谈没有尽兴如意,他对那种循规蹈矩的座谈方式,感到兴趣索然。他喜欢海阔天空的自由畅谈,不习惯正规的提问式座谈。加之参加座谈的学生,大多是欧美两洲的青年,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了解甚少。常常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发生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混淆。所以,这次座谈结束后,张学良没有尽兴。他不悦的情绪是委婉流露出来的,张之丙女士和洛克斯立刻意识到,韦慕庭在小镇上交待给她们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特别是韦慕庭对她们的叮嘱:“要寻找打开仓库的钥匙!”直到座谈会结束后,张之丙才认识到,打开记忆仓库的钥匙其实仍然没有拿到。于是,她们就把自己希望利用张学良在纽约逗留的宝贵期间,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口述历史的想法,正式地提了出来,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韦慕庭的首肯。于是,一项《关于在美对张学良将军进行历史口述的计划》,便正式提交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讨论。

二 行前的准备和韦慕庭的担忧

哥伦比亚大学对欧美历史名人的历史口述

工作,约起源于1927年。最初的发起人为“哥大”历史系教授、著名美国史学家阿兰·勒文斯。当初勒文斯所主持的历史口述重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几位下野的重要政治家,如杜勒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从1952年起,由韦慕庭教授主持的对在美华裔人士的名人口述工作也随之起步。在韦慕庭的主持下,最早开始了对李宗仁、胡适和顾维钧等旅美华裔政治人物的历史口述。也可以说韦慕庭是“哥大”华人历史口述的开山鼻祖。

由著名教授张之丙和美国学者洛克斯、索伯尔曼等人起草的采访张学良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主任罗纳德·格里勒博士的赞同。

7月初的一天,经“哥大”采访小组与蒋士云女士的预先协商,张学良终于同意在蒋士云公寓里进行一次计划中的采访预演。由华裔教授张之丙担任主要采访人。她按照行前韦慕庭教授亲自审定的预演提纲,简单的接触张学良头脑中的记忆。张学良在初次预演中相当配合,他按照张之丙提及的所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张学良显然对“哥大”如此严谨慎重的安排感到满意,他在回答提问时表现出来的睿智和坦率让所有“哥大”人员都感到未来的合作将是非常愉快的。这也就是“哥大”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处主任罗纳德·格里勒博士和女教授张之丙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7月中旬,一个专门的采访小组正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张之丙女士出任这个小组的主要召集人。在这个小组里,有英文译员、记录员和电视录像师,最后,经韦慕庭教授提名,决定张之丙的姐姐、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文物珍藏室工作过的张之宇女士,也参加这次为期五年左右的历史口述工作。

接下来的是筹划口述历史的全部运作资金。“哥大”为此特别聘请一位在国际合作方面卓有建树的著名律师参与此事,名律师叫彼得。由他首先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基金计划草案,对长达五年多的口述历史工作费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筹划。哥伦比亚大学意识到对张学良这样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进行全面采访,花费的时间与资金都

应超过从前对顾维钧、李宗仁和胡适等人的预算。因为张学良的记忆正在随着年龄的老迈而发生退化,所以,这一历史口述的任务无疑具有相当的迫切性和艰巨性,甚至带有明显抢救史料的性质。

全部运转基金拟以社会与民间两个方面分头进行筹组。“哥大”的这一计划,从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尽管不能如愿筹措到一笔可供采访小组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不断从美国纽约飞往台湾的路费、宿费和其它昂贵的费用,但是,工作小组的热情甚高。包括张之丙女士和她胞姐在内的许多中美成员,纷纷主张以尽义务的方式来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她们都把抢救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成义不容辞的史学研究和为学术尽一份义务来看待。这样一来,当初认为最难以解决的基金问题,竟在张之丙等人真诚的治学精神和目标一致的努力之下迎刃而解了。

1992年2月23日,就在张之丙小组即将赴台湾采访张学良前夕,住在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口述历史主要策划人韦慕庭,在得知基金筹划遭遇困难的时候,他特别给张之丙小组送来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他亲笔写的一封信。大家见了韦慕庭的来信都异常振奋,只见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他的“礼物”中,很中肯地写出他对张学良这个人的认识,和他对即将开始的口述历史工作的流程大纲。他详细说明了最后采访成果的模式与理想化口述历史资料的作用,譬如最后的口述成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包含什么样的内容等等。同时他也向这个工作小组成员,提出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该先读的文件。

三 口述过程中常常会 发生意外的触礁

张之丙等人在参阅韦慕庭亲自提供的所有文件过程中,被一些从前没有接触到的大量珍贵张氏个人资料所感动。小组成员感到对张学良即将开始的采访,与从前新闻记者对这位中国东北军将领的那些即席问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记者的提问常常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和即时性,而他们的采访完全是为着历史的新闻性而来的,而韦慕庭主张哥伦比亚大学对张氏的历史口述,则一

定要把采访的重心放在“历史”这一层面上。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真实”放在首位。反对为引起所谓新闻效应而进行的取舍性询问。那样的话,很可能将未来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搞成一部新的“访谈录”。韦慕庭说:“我们‘哥大’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张学良。当然,也难免在访谈中出现一些不理想的,或者加了虚构的细节。但是,总体来说,口述历史必须是真正的历史。其中包括张学良一生中在重大历史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想和他对所经历史的评价。”

张之丙率“哥大”采访小组于1992年5月上旬飞到台北。小组到达台北以后,张学良和夫人赵四小姐正在生病住院,不久,她们小组就来到了台北大屯山下的“朴园”,6月,“哥大”对张学良的历史口述便正式拉开了序幕。张之丙小组依据来前由韦慕庭、罗纳德·格里勒、洛克斯等制定的谈话纲要进行由浅入深的谈话。

这种以自由交谈方式进入悠远历史的访谈,很快就为张学良所接受。更让张之丙小组感到欣喜的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也参加了访谈活动。还没等小组提出口述的纲要,张夫人就主动为少帅接受采访作出了必要的准备。张学良按照采访小组拟定的12个访谈主题,开始进入正式的谈话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除韦慕庭等人提出的12个谈话主题之外,又临时增加了四个问题,即:一,西安事变前后发生的事情;二,尚未公诸于世的张学良将军个人情况;三,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关系;四,张学良在战争与平时时期与其幕僚及部下的关系。

张之丙小组在正式接受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张学良在与“哥大”采访小组进行谈话的时候,赵一荻总是喜欢守在旁边,遇到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她还会中途插话或者打断。她经常在旁提示张学良说:“给他们讲讲……”又说:“这个问题不好讲。”

初时,张之丙小组对赵四的参与持乐观的态度,但是,越进入口述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赵一荻的插话就越多,有时她会在张学良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以干预的语气对张说:“你说得太多了。”又说:“这个问题你根本不能回答。”等等。

让张之丙小组感到吃惊的是,由于张学良和夫人之间多年形成的关系,致使他随时都对夫人的暗示或明示,采取言听计从的作法。如此一来,就给正在进行的历史口述带来了新的障碍。

采访小组把在台湾遇到的情况,及时向美国纽约的“哥大”通报,格里勒博士又将发生在台湾的问题,通告给住在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韦慕庭。韦慕庭教授来电指示说:张学良、赵一荻唇齿相依的感情是在患难与共中多年形成的。我们的小组必须要面对采访中的这一难点。他又提示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勾勒出将军一生生活的真实图景,对访谈中所听所问和当时的感想,都要做好笔录。不必过多的干涉细节。更不要对赵四小姐的干预作出任何不利于采访的表态。顺其自然,是这次特殊口述历史的首要条件之一。

张之丙小组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当采访小组按照“哥大”预先拟定的谈话要点,把一些相当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交给张学良,希望他协助认定或加以澄清的时候,往往会发生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就是,张学良竟会有意无意地将小组提出的具体问题丢放在一旁,却兴趣盎然地纵论其它与此无关的问题。他甚至对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避而不谈。“哥大”口述历史处主任格里勒博士等,把上述情况报告给韦慕庭后,这位熟悉历史口述章法的老人指示说:不要操之过急。在特殊的时候需要不时改换话题,或者以后再相机提出。他又告诫说:张学良先生也许需要有更多时间接受我们提出的那些新的信息,并把它们与其它事件联系起来,然后才能作出他认为合适的回应。同时也要考虑到他的年龄,他需要在认真的回忆和取舍之后,才能作出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张之丙小组在进入深层次的历史采访过程中,很快发现新的难点又出现在她们的面前。那就是,张学良先生有把历史事件过分简单化加以谈叙的习惯。同时这位老人也喜欢像普通人那样,善于把许多史学家眼里看来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他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并加以表述。这样一来,会不会有把历史真相湮没在个人回忆的片面臆想之中的危险。张之丙小组担心的是,张学良的记忆会不会有误,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较为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上,口述者会不会掺有

个人感情的成分在内,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创作和虚构的成分在内。张之丙小组甚至发现,对于一些历史上早已经定论的人物或事件,在张学良进行回忆时,有时会发生截然不同的观点或印象。甚至有些史实即便张学良从前曾经对记者们这样讲过的,但是此次在“哥大”对他重新进行访谈的时候,他本人的话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有些出入甚至还相当大。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哪怕只是一些非常细小的部分,张之丙小组也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将这种情况反馈给在美国的“哥大”口述历史处以后,韦慕庭又作出新的指示,他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因为同样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讲叙,有时会因为不同的采访对象,不同的场合而发生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是:“任凭讲述人兴之所至”。“任他随意讲述”和“让他一直这样讲下去就是了”。

张之丙小组就是按照“哥大”历史口述处和韦慕庭的随时指示,不断调整和变动对张学良的访谈策略。她们只是相机地掌握着张学良的思路方向,不作更大的偏离即可,她们必须尊重讲述者的思路,决不能在谈话中打断或中止他的思路延伸。为此,韦慕庭教授还具体指示说:要留意张先生谈话时的面部表情和他的肢体语言,以此来判断张学良先生心理状态的线索。韦慕庭特别告诫张之丙小组说:“千万不要把这扇好不容易才打开的门再关上闭死。我们的艰苦努力和耐心等待,最终将会得到报偿的。”

四 韦慕庭在口述资料解密前辞世

1993年春天,张之丙小组在台湾的口述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当张之丙小组部分成员暂且撤离台北,回到纽约“哥大”以后,张之丙等人才发现,已经进行的二年多历史口述所获得的资料,还存在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张学良的谈话是在时断时续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思路也会因自己的记忆出现偏差,或随着兴之所至进行谈论的情况,会出现一些有碍整体的问题。所以张之丙小组已经预见,将来一旦把这些口述资料都系统加以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

过于支离破碎。形成一部完整系统的《口述历史》尚需相当大的加工整理过程。

张之丙小组就此问题又请教了隐居在美国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韦慕庭教授。他指示说:我们的录音,手写速记,最后都必须编辑成一份相互连贯的个人传记。当然,所有的编辑整理工作不是在访谈的同时,而是在张学良先生将所有头脑中的记忆都形成文字以后,才能进行系统的编辑和整理的。鉴于谈话中难免有过多的枝蔓,难免有一些内容的重复,头绪也较繁杂,所以后期编辑工作是这部历史口述成败的另一个环节。而不影响目前继续对张氏进行的采访。今后还要进行的后期访谈,仍要尊重张学良本人的谈话习惯,不必再作新的调整 and 改变。

“哥大”认为,这次对张学良进行的抢救性历史口述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哥大”口述历史处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成功先例。从50年代开始的对胡适的历史口述工作,花用了将近八年的时间;对李宗仁的采访大约花去了近十年的时间;而对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历史口述,则整整花用了17年。现在以张之丙为首的访谈小组对张学良的谈录,时间是最短的,而且谈录的资料却是最多,最具有珍藏的价值。

1996年当韦慕庭教授即将走完漫长人生之旅前夕,他曾对已经开始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作过如下评论,他写道:“张学良的个人文件比之顾博士(指顾维钧——引者注)的更为珍贵重要,在经过分类整理之后,将在特别阅览室向研究者们开放。这些结果是张之丙始料不及的。它们主要得之于她不知疲倦的执着和非凡的机智。同时也得益于她的姐姐C·Y·贺张之宇的大力协助。她们投入这件事几乎全是出于自愿,计划的经费则出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慷慨的中国朋友。其结果——由于张学良将军超凡无私的精神——就是呈现给大家的这些珍贵文档!”

韦慕庭讲完这些话后不久,就因病逝世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 李松凌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生于1881年2月4日。李烈钧之父李骏兴与其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为忠王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李骏兴兄弟返回故里，但是反清决心不移，故其兄弟面部或手臂上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始终保存，以明心迹。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李烈钧成长影响很大。李烈钧在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先严兄弟四人太平天国时均弃儒从军，事败返回故里……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臂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辈述甲午战争，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李烈钧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当时，孙中山亦在日本鼓吹民主革命，李谒见孙，“倾服之忱，油然而生”。李在求学期间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20余年，奔走民主革命，出生入死，不遗余力。冯玉祥在《〈李烈钧自传〉读后》一文中评价道：“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加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李烈钧同乡好友、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长的杨庚笙回忆，孙中山非常器重李烈钧：“总理每语党员，言及先生，常称之为协和先生，先生往谒总理，总理必起而迎之，是可知总理重视先生矣。”

李烈钧历任苏、皖、鄂、粤、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江西省都督、军政府参谋总长、江西省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特派驻日全权代表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将领和帅才。孙中山称赞云：“协和先生

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

统军征战，援鄂解武汉之危

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实行征兵制，李烈钧在其老师、江西协统吴介璋推荐下入伍，并授以营长。李烈钧训练士兵时，技术动作要求严格，并灌输革命思想，所以他带领的队伍不仅军事动作灵敏，而且思想一致，革命气氛浓厚。对此江西旧官吏既怕又恨，企图将李烈钧逮捕谋害。幸得业师吴介璋护救，得以脱险，前去云南。当时云南总督李经羲注重训练新兵，重聘有为青年参加军事训练。李烈钧被聘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李烈钧在授课中，既讲军事，也讲政治，为革命积蓄力量，以实现同盟会推翻清王朝的奋斗目标。李烈钧在云南两年，培养不少军事人才，播下火种。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辛亥革命，敲响清王朝寿终正寝的丧钟。清王朝疯狂反扑，做最后挣扎。武汉一度陷于清军包围。李烈钧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各方人士，积聚军力，以解武汉之困。李出任五省联军统帅，亲率大军援鄂，使起义军危机解除，民国亦随即创立。

两度主持赣政，造福乡梓

李烈钧两度主持赣政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辛亥革命后，首任江西都督吴介璋，在位两个月即辞职隐退。接任者是彭程万。彭上任后，洪江会猖獗，弄得彭程万焦头烂额，难以招架，彭“不安于位亦去之”。这时地方人士推举马毓宝为赣督。马毓宝对扰乱社会者多方迁就，以致匪患日趋严重，

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江西议会选李烈钧为都督,并电请孙中山总理任命。

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期间,治理有方,铲除匪患,安定人心,整顿财政,兴办实业,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有识之士,多来协助,使江西面貌为之一新。

李烈钧重视扶掖提携青年,在他任江西都督期间,大力选拔本省优秀青年,官费派往日本、欧美求学,造就专门人才,以备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有一些人,如胡先骕、陈寅恪、程孝刚等人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李烈钧出任省主席,再次主持赣政。李在管理地方政务中,执法严格,但严而有度,是非分明。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在《回忆义父李烈钧》一文中写道:“义父执法虽严,但从不妥杀一无辜,他常说‘我所杀之人皆系人人曰可杀,如民国初年督赣期间肃清匪患,将害民最酷的龙正文、陈细鬼等正法,乃是彼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凡是可杀可不杀之人,我是不杀的。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憾也。’仁者之心,溢于言表。”

李烈钧在督赣中留下丰功,也留下良好口碑。在江西曾流传两个其爱民的故事:

一个是李烈钧释“土匪”的故事。有一天李烈钧外出巡视,见卫队抓来一“土匪”,五花大绑,准备押送官府问罪。李见状上前询问,得知被捉者因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误入歧途,于是命手下人把他放走。并送银钱周济其生活。翌日,被捉人率其同伙来归。这时有人怀疑有诈,劝李烈钧加以戒备。李说:“我至诚待人,从不妄杀一无辜,彼怀德畏威,何诈之有。”将其全部收编,妥善安置,从此远近来归者日众,壮大了北伐革命军的力量。

二是李烈钧保桑梓的故事。李主持赣政期间,当汪精卫等人把持武汉政府后,派人来江西拉拢李未成,于是一方面离间滇军将领朱培德等人同李烈钧的关系,一方面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江西反对李烈钧,给他制造麻烦,蓄意挑起内战。李愤慨地说:“我若不是江西人,害怕糜乱桑梓,对不起父老子弟的话,便要挥军打它个落花流水。”于是李烈钧把省政交给朱培德,自己率一部分军队离赣进入浙江。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李赋诗表明心迹:“哂矣无能我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打响讨袁第一枪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野心早有觉察和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2月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时,李就感叹说:“国家从此多事矣”,并与其同乡挚友杨庚笙相约:“一旦有事,当以贵县湖口为抗拒袁世凯的大本营。”

李烈钧督赣不久,便邀请孙中山来赣巡视,并表示坚决拥戴。袁世凯闻之极为不安。于是对李烈钧采取软硬兼施手段,先是以巨款和晋勋为诱

饵进行拉拢。派大员来赣游说:“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酬,并晋勋一位。”李严词拒绝,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诱耳?”袁见利不能诱,便想安插亲信做江西民政长,用以牵制李烈钧。但这一手又被李识破,省议会持约法反对,使袁氏亲信不能到任。袁恼羞成怒,于1913年6月,悍然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袁世凯又免除安徽、广东、湖南三省都督。因为他们对袁也是采取抵制态度。

袁世凯免除四省都督、刺杀著名国民党人宋



李烈钧(1881-1946)

教仁，彻底暴露了其反动本性和企图当皇帝的野心。孙中山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力主武力解决。为此，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商讨讨袁事宜。会上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武力讨伐，有的主张法律追究，众说纷纭。尽管孙中山苦口婆心说服与会者，但认识仍未统一。李烈钧见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历数袁世凯之罪状，坚决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回江西首先发难。李烈钧说：“汉贼不两立，吾侪和袁贼不能并存，有袁无我，有我无袁，讨袁义举，万死不辞。”孙中山对此深为感动，说：“知我者，协和也。”

李烈钧赴上海开会之前，就委派杨庚笙回湖口做讨袁准备。会议一结束，李便兼程赶回湖口。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讨袁，发布《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和《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三大文献，昭示中外，与人民约法三章：1、誓诛民贼袁世凯，2、巩固共和政体，3、保障中外人民财产。这三大文献影响巨大，流传广泛。

起义初期，连战皆捷。但因敌众我寡，江南其他数省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援军久等不到，使起义军处于孤军作战之中，终归失败。

只身入滇策动云南举兵讨袁

湖口首义失败后，李烈钧去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讨袁经过情况，然后受孙之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和讨袁主张，旋即赴欧洲考察，广交朝野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袁世凯镇压湖口起义后，踌躇满志，加快复辟帝制阴谋，王公爵位，分别内定，登基准备，紧锣密鼓。此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怙恶不悛的反动本质认识加深，痛恨日甚，急思回国讨伐。孙中山尤感时局严峻，忧心如焚。于是，急命李烈钧迅速回国，策动云南地方长官唐继尧举兵讨袁。

孙中山深知李烈钧在云南有很深的基础，能胜任此重托。云南著名军政人物，如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黄毓成等都和李烈钧有同学或同事关系，而李的学生中，已有多人在云南担任营长以上

职务。

1915年10月，李烈钧从欧洲辗转回国，先入越南从海防转河内，欲从老开（街）入滇，以为到此沿途不会再有阻挡。不料河口关监督听说李烈钧到，即密电唐继尧请示，唐开始尚未下决心反袁，所以态度犹豫不决，故河口关监督阻止李烈钧前进。李对此既愤又急，直接致电唐继尧，表明来意，电曰：“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继尧得电后，权衡轻重，下决心讨袁。于是复电表示欢迎，并告将派其弟唐继虞躬迎，愿稍候。李到昆明不久，蔡锷亦逃脱袁世凯的监视，从北京回到云南，于是李烈钧和蔡锷、唐继尧三人歃血为盟，举兵讨袁。

1915年2月25日，云南成立护国军政府，宣布独立。由李烈钧、蔡锷、唐继尧三人署名发布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20条罪状，号召全国人民：“修我矛戟，盍赋同仇！……共扶社稷。”云南护国军政府，决定组建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出师四川；第二军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向两广进发；第三军由唐继尧任总司令，坐镇云南，留守后方。护国军出师有名，受到所到处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连战皆捷。护国军的节节胜利，震破了袁世凯一心要当皇帝的美梦，迫使他退位，后忧惧而死。

就任参谋总长，建议创办黄埔军校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蔑弃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广州号召开展护法斗争。9月1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任命李烈钧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从这时起，一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止，李烈钧以大元帅府高级幕僚长的身份追随孙中山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朝夕相处，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李烈钧协助孙中山平定了陈炯明、沈鸿英等人的叛乱，使广东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李烈钧目睹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战事频繁，民无宁日的现实，时有所悟。他认为为了迅速铲除军阀割据局面，统一全中国，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校的建议。他在自传中说：“余向总理建议，为了健全本

党,急应培储党军干部,总理然之,乃创办军官学校于黄埔。廖仲恺时充财政,乃请其充分筹款,冀收速效。开学之日,余及谭延闿随总理莅该校,参加典礼。余奉总理命,说明本党建军之旨。”

伴随孙中山北上,语析 张作霖,怒斥段祺瑞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段祺瑞邀请北上,共商国是。李烈钧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身份随行。同行者还有孙科、邵元冲、戴季陶、汪精卫等人。

当时,孙中山已重病在身,为了顾全大局,奋不顾身,抱病北上。行程是取道日本,再到天津,然后到北京。途中孙肝病复发,李曾建议在日本小作停留治病,孙说:“国事当头,无暇顾此,俟到津后再议。”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到天津造访张作霖。中山一行人至客厅坐良久,张始出,神情傲慢,旁若无人。宾主寒暄后,孙对张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傲而无礼,气氛显得紧张。李烈钧见此局面,立即站出解围。他对张作霖拱手致意后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孙中山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这时谈话气氛变得非常友好、和谐,张作霖一再举杯请大家用茶,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孙中山病逝。伟人长辞,举国震惊,万民哀痛。众推李烈钧主持治丧事宜。众人商议,认为在社稷坛为总理停灵和举行治丧仪式最为合适。于是通知段祺瑞。段派代表与汪精卫接洽,趾高气扬说:“执政府对在社稷坛治丧表示不能同意。”汪不知所措,急告李烈钧。李闻之,怒斥来者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首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官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社稷坛,执政尚能持异议耶?”代表在李烈钧斥责下,收敛态度,答应回去报告执政。次日,段祺瑞迫于形势,亲自写信给李烈钧,说他完全赞同在社稷坛为孙中

山治丧,并假惺惺地表示亲自来吊。

3月19日,追悼会举行之际,段祺瑞忽托词脚肿,改派内务总长代表致祭。李烈钧对段祺瑞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非常气愤,指出:“段祺瑞等人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也。”

应冯玉祥之邀屈尊欣往, 段、蒋封高官坚拒不从

姜伯彰在为《李烈钧自传》撰写的跋二中称道:“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其合也,应冯焕章氏之请,宁作食客于张垣,其不合也,拒北京政府之命,曾薄总长而不为……”这个评价客观地道出了李烈钧可贵的人格与气节。从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屈尊欣往及段祺瑞、蒋介石封高官坚拒不从这两个细节,可以说明评价的公正。

孙中山逝世后,西北军统帅兼西北边防都办冯玉祥率大军开赴塞北重镇张家口,礼聘李烈钧为西北陆军总监,付以督导整训全军之权。冯玉祥之聘不仅让李烈钧慎重思考,也引起国民党要员的关注。当时在京的国民党要员如张继、李石曾、覃振等人都赞成李与冯合作。人们认为通过合作可以作西北军的工作,推动官兵思想转化,接受革命道理,这支部队将成为国民党在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为国效忠的责任感并俯应党内舆论,李烈钧欣然应冯玉祥之聘,屈尊前往张家口接受西北陆军总监职位。

冯玉祥对李烈钧向有推崇、敬仰之情。他常对人说李烈钧是既善于用兵,也善于管将的人。他称赞李烈钧“集大仁、大智、大勇于一身”,“今之奇才也”。李应聘之后,冯待以“军师”之礼。李烈钧利用合作共事机会,积极向冯玉祥及其官兵灌输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李烈钧影响下,冯及其所率队伍发生积极变化。不久,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声明全军20万将士一律加入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合作共事,朝夕相处,李烈钧与冯玉祥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问题的共识越来越多,个人之间的友谊也逐步加深,成为挚友。

直奉战争,奉系打败了直系,推翻了北洋军阀

曹锟政府。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主政北京,临时设置摄政内阁。段祺瑞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但李对此重任不予理睬,拒不赴任。这是因为段祺瑞政府背离孙中山主张,不肯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李“薄总长而不为”的举动,既体现了李对孙的忠诚,同时也折射出他的“不争权位”的人格亮点。

李烈钧处事、言行,从不随人俯仰,是非好恶,总有个人主见。他对后起的蒋介石,早有厌恶之感。据李烈钧挚友杨赓笙讲,他常说“羞与蒋介石之流为伍”。1927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汪精卫等人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复职,并纠合国民党全体中委在上海举行会议,这时所有分散在南京、上海、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都前往赴会,唯独李烈钧拒不参加。

蒋介石复职后,开始第二次北伐。蒋想请李烈钧当他的参谋总长,李坚拒不从。李烈钧素鄙其人,厌与其合作。1934年,李烈钧赋诗讥讽蒋介石的愚傲与专横:“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材。”李烈钧认为蒋介石是政治上的盲人,治国不当,不知要把中国这艘巨舰引向何方?

送子从军,卫社稷收失土

1937年,卢沟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高潮。李烈钧非常兴奋,看到了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的希望。然而此时,戎马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烈钧,已经年过五旬,且重病缠身,不能亲赴前线为抗日战争效力。但其杀敌报国之心依然如初。李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五个儿子,送到军队,让他们杀敌救国。其中有两个正在大学读书,也动员他们中断学业,奔赴疆场。他勉励儿辈英勇杀敌,收复河山。他在赠诗中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李烈钧常用书信、和诗等方式跟同乡挚友杨赓笙切磋问题,坦露心迹。他在给杨的信中透露了他送儿从军的思考过程和意图。写道:“多年备位中枢,旧铗重弹复以老病浸淫,不能上前线杀贼,遂令儿辈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也。”李的大儿子李贻鹏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

主张国共合作,反内战盼和平

李烈钧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对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信不移。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李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联共问题在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孙询问李的看法。《李烈钧自传》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时间和过程:“十三年春,本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迨时联共主张,本党意见极不统一,争论至烈。总理询于余,余答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欲使本党强大,必联共而后可。总理称善。”

当时,李烈钧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常有往来,关系良好。后来国民党极右势力召开以反共为目的的西山会议时,多方拉李烈钧参加,被他断然拒绝。

李烈钧早就认为蒋介石是个不可信之人。因此,当蒋介石一再挑起内战,干戈相见,屠杀同胞的时候,李烈钧更感气愤,持坚决反对态度,常用诗作表达忧愤之情。他在《过金陵舟中晚眺》中写道:“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阅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和对红军进行“围剿”的态度。

抗日战争初期,李烈钧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发起《团结抗日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共御外敌,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烈钧积极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共匡国是。他曾动情地写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全国一致抗日,流血牺牲,盟邦助我,终获胜利,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允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期其早日实现。”

1946年2月22日,李烈钧因肺炎及心脏麻痹不治,在重庆逝世,消息传出,举国悲痛。中共中央除发来唁电外,周恩来和董必武等还亲临吊唁。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归葬于将军故乡江西省武宁县。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作者说明:本文根据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高级翻译)提供的史料、书刊和口述材料写成,特此深表谢意。

科教界一代宗师张维院士

● 李开鼎

毕生献身科教事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前深圳大学校长张维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壳体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张维教授在壳体理论和实践方面,创建了不朽的业绩。1937 年,他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英国,翌年以优异成绩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之后赴德国继续深造,于 1944 年获工程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论述了攻克薄壳结构与理论中的难题,首次用 $1/3$ 阶复变量贝塞尔函数求得了粗圆环壳一致有效渐近解,比世界著名的杜玛金、克拉克等学者对同类问题的渐近解早了 5—6 年。他给出的第一个 $1/3$ 阶贝氏函数表,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同类表还早一年。

张维院士壳体理论与实践的成就,是对人类科学知识宝库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在国际工程力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华民族在工程力学领域争得了荣誉。

壳体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外行人茫然无知,或不甚了了。为了弄清其科学内涵,我特意请教了清华大学著名工程力学专家任文敏教授,他说:壳体理论是工程力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壳体由于受力时截面上的应力分布均匀,通常成为薄膜受力,像鸡蛋壳均匀受压时具有很高的强度。圆环壳是一种类似汽车轮胎、救生圈那样的薄壁双曲的壳体。圆环壳体有两个曲率,外圈两个曲率都是正,而内圈两个曲率分别是一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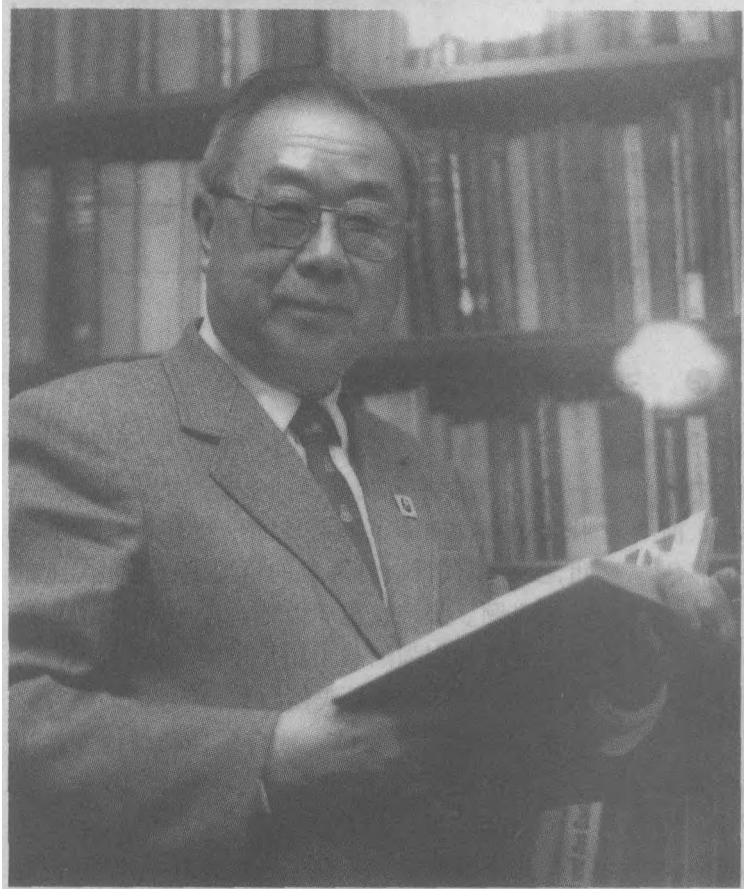
一负,在数学上称为高斯曲率变号的壳体。要寻找正负高斯曲率不同区域的一致有效解,在 20 世纪 40 年代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是世界上的一大难题。张维教授凭借他聪敏的数学天赋、杰出的智慧和倔强的毅力用手中的笔进行了计算,终于找到用 $1/3$ 阶贝氏函数解,并且他的解计算方便、收敛快,在全域一致有效;同时,他还给出了 $1/3$ 阶贝氏函数的表格。这在力学发展史上是一大贡献。

张维教授极其重视力学理论联系实际,把壳体理论转化为生产力,以适应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他毕生为之追求的目标。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工程力学界对壳体理论知之甚少。张维教授率先在清华大学焊接车间屋顶设计与施工中应用柱形薄壳屋顶,树立了样板。与此同时,他发起组织编写了《壳体结构文汇》,普及壳体理论知识。他亲自在北京高等材料力学讲习班,向工程技术人员讲授“壳体结构入门”,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

壳体理论在现代化建设中广泛应用,使许多优质美观的大跨度土木建设工程应运而生。例如:50 年代建成的北京乒乓球馆屋顶、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屋顶、北京站等,至今仍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20 世纪 90 年代兴建的北京西客站中央大厅,跨度很大,中间无支柱支撑,都是借助壳体受力特点的结果。由于壳体受力合理,可以用较少材料,做成跨度很大很坚固的结构,节省了成本。

上世纪的 60 年代后,张维院士坚持从事锥壳、斜锥壳、圆环壳的应用理论基础研究。他对潜艇的耐压舱加强圆柱壳体、头部斜锥壳体的强



张维

度、稳定性的研究,以及对飞机的机身、机头锥壳的强度、稳定性研究,对推动我国潜艇、航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受到海军、空军和船舶等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在我国分离工业工程发展进程中,他指导研究生从事高速离心机的研究,采用圆环壳段,改进了转子的固有的特性,取得很大成功。同时,为了提高核电站管道系统的安全寿命,张维院士提出进行流固耦合激发振动的研究,以及改刚性连接为波纹管柔性连接的研究,可以降低核管道的内应力。上述多项研究成果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教育改革的前驱

1983年,国务院任命张维教授出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他承担的课题是:“办一所新型大学”。所谓新,就是要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教育机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校风和学风等进行全面改革,不能率由旧章、走老路。

在校园规划和建设方面:深大校园没有照搬国内现有大学建成的模式,不造围墙,不把学校与社会隔开。竭力避免全国形成的学校办社会的弊端,尽量不在校园内建教职工家属宿舍、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社会事业,使学校成为美观宁静的学府,使学校领导能够摆脱繁琐的行政事务,全力以赴抓好教学、科研工作。

在办学方针方面:张维校长根据国际和国内高等教育多年来的经验和他本人几十年的亲身体会,认定要办好大学,就必须抓好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工作。大学既要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又要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抓教学:他从深圳特区经济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与深大的实际可能出发,先设立建筑、经济、法律和外国语四个系,从翌年起,继续增设电子、机械、土木、数学、物理、化学和中文系。学校的教学工作,包含业务教学、政治思想教育、体育锻炼和实践安排。教书育人,是办学的主题,体现办学的指导思想。

为了快出人才、出优秀人才,实行新的教学体制:一是实行毕业生不包分配、自谋职业的制度。二是实行学生交纳学费制度。三是实行学分制、双学位制、主修课与副修课制。他率先批判和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沿袭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大学生不交学费、大学生没有选择课程和决定学习方向的自由权等旧体制。

为了提高学生质量,张维校长强调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些基础课要由教授讲授,教师的水平要提高,经验要丰富,讲授要有启发性,在学科的发展上有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画龙点睛。这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一项根本性措施。他经常如数家珍似的称道解放前清华大学名教授讲授基础课的盛况:理、工学院一年级的物理课,先后由叶企孙、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和钱三强等教授讲授;化学课由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教授讲授;数学课由郑桐荪、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

段学复等教授讲授;生物课由陈桢、李继侗等教授讲授。那个时代毕业的校友,日后工作中有所建树,均与在校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有关。他还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瑞士苏黎世联邦高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均由著名教授给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的实例来佐证。

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特开设全校公共课(包括英语)。

为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计划安排三次实习,第一次在深圳,第二次在国内,第三次在香港。

为了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思想品德和独立工作能力,实行勤工俭学。

为了活跃学生思想,促进互相交流,增进群体观念,改变国内大学按系、班级分配宿舍的习惯做法,实行由学生不分专业、不分年级的同性别的自由组合。

抓科研:张维校长把科研工作看作是办好大学、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根本任务。

首先,强调图书馆对大学的重要性,图书馆是知识库,是大学的心脏。所以,在建校规划中把图书馆放在中心位置,从设计到施工,都向国内外公开招标,保证了深大图书馆建设的高标准、高速度 and 高质量。

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就聘请了国内资深教授担任馆长。同时,向国内外著名大学征集图书期刊,丰富图书馆的馆藏。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和杜塞尔多夫大学就捐赠了几万册图书和期

刊,其中的全套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是国内少见的珍品。

学校要发展,还要抓生产。他们逐步建立校办企业,开发学校的经费资源,增加学校活力。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张维校长从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把握了“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一理念,确认教师队伍,尤其是教授队伍,是保证提高学校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假如没有相应的教授队伍,大学就是徒有其名。张维校长采取了分工聘请教授的方法,他亲自负责选聘系主任的工作,各专业教授的选聘则由各系主任负责。经教育部批准,由北大、人大和清华支援。他求贤若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有的直至“五顾茅庐”,终获成功。与此同时,学校还制定了一套培养年轻教师队伍的规划和实施细则,为培养新生力量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学校工作中,他特别注意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特别注意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抓调查研究,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二是抓组织建设,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有职、有权、有责。三是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张维校长情系深大,他说:“创建深圳大学是我后半生中特别值得回忆的一件事。”这是令他神往不已的美好时光。

(作者系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原副会长)

(责任编辑 致 中)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2002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通告

本刊编辑部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现已全部售完,特此告知,请勿再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电话:(010)68532048 邮编:100045

有感于爱因斯坦的名言

(外二章)

● 李一鑫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曾邀请当时已名满全球的美籍犹太人爱因斯坦当第一任总统。但爱因斯坦谢绝了。

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

这是多么不同流俗的人生观事业观价值观！多么执著又多么质朴的追求！

的确，无论是他以大量方程式推导出来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是量子理论，等等等等，其伟大深邃的科学和哲学意义，对后世自然科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以及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可以说是永恒的并且历久弥彰的；后人在爱因斯坦所发现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基础之上，将建筑起何等样的更新更高的科学大厦，尚不是我们今人所能完全想象描绘的。从这个重大意义上说，是任何政治家所起的作用都无法比拟的。

这是否也是“科学之树常青”这一论断所包含的意思之一呢？

然而，历史评价与史书评价并不是一回事。拿中国来说，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史书，是官方史书庙堂史书帝王将相们的史书，内中充斥着大量这些人物曾一时被奉为金科玉律，却大多禁不起时间磨洗的大话甚至废话，和他们的家事生活起居，乃至他们所“幸”过的女人们争宠夺爱勾心斗角的无聊琐事。连挥斥古今的毛泽东，在“数风流人物”时，也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之流，作为历史上曾为各自政治目的“竞折腰”的“无数英雄”的代表。至于如今影

视中的历史剧（多一半够不上这称呼）总是围着帝王后妃大人老爷转，好像除了这帮人无所谓历史，则又不在话下了。

当然，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史书上却没有他们的几寸位置。事实上，对人类社会作出过骄人贡献的科技成就诸如中国四大发明之类，恐怕多是无数凡人的心血积累，却往往把荣誉归诸大人物，如指南仪的发明归诸轩辕黄帝，养蚕缫丝的“专利”归诸他的妻子“嫫祖”（这名字就是根据多半是臆造的史事臆造出来的，与“燧人氏”呀“有巢氏”呀相同），而纸的发明者却被说成监工太监蔡伦（现在已知蔡伦出世前早已有纸）。更不公平的是，诸如张衡、祖冲之、梅文鼎；张苍、耿寿昌、贾思勰，秦越人（扁鹊）、张机（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公输般、李春、毕升、黄道婆，乃至19世纪中国的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许多中国历代科学理论家和发明家，见诸正史的记述，大多寥寥数语，甚至阙如，与其历史贡献很不相称。及至无数以“轮人”、“舆人”、“弓人”、“矢人”、“冶氏”等为名氏，作为车、弓箭、冶炼术等等创制者代称的无名工匠——实际的发明者，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则是见多不怪的。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古代科学典籍，如《考工记》（记述中国古代多种科技工艺之书）、《内经》（集古代中医理论大成之书）、《九章算术》（其中包括开方、一次方程、勾股……之类代数和几何知识）等，是没有作者的，那些作者只留下了奉献，名字却对不起——湮灭了。

这都说明,科学技术以及这类专业人才在中国古代是如何地位低下。

顾准说中国(或许不止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即史臣,臣的初始意思是奴才、仆役,故除了少数不怕死的之外,史官必须是权力的笔杆子,是官方媒体,即作为某一时代历史的记录撰写者,向后人作交待作宣传作中介的。记录什么,不能记录什么,怎么交待怎么宣传,里面当然大有政治。所以史官文化又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是政治统治者即权力所掌控的文化。它不能完全忠于历史,却必须忠于作者的主子,这是史官文化的特点。古代大多数科学家实业家,纵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有贡献,但如果并非同时也是权力圈中人,而是臣仆,人格和地位受贬损压抑乃所必然。

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就应该承认,恰恰是那些在史书中大大受贬损的非官场人士,为奠定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璀璨文明出了大力,立了头功。他们对我们引为骄傲的历史所作的贡献,应远远大于那些盘马弯弓争霸夺权并已“流芳千古”的权势人物的业绩。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价值现,与视权力官阶之差为人的价值之差的官本位价值观,相去不是千里万里,而是南辕北辙。

在知识经济社会已到来的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大不一样了。但愿我们能真诚地从经常挂在嘴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出发,咀嚼爱因斯坦的这一不朽名言。

“粹白之裘”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用众》,言简意赅,是古智者贤人悟道之言,令人联想很多很多。

其实,狐狸中,有一种银狐,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极北地区,是纯白色的,但它是不是就那么“粹白”,一点杂毛没有,恐也难说。大凡一件狐裘,总是需要集不少只狐狸的皮毛来制作,而“粹白之裘”就更需在“取之众白”时汰杂取粹。《吕氏春秋》的作者未必见过极北的银狐,故云

“天下无粹白之狐”,其所谓“取之众白”,可能是指取之某些狐狸腹部的白色皮毛,那所需狐皮当更多。

做事为学,“取之众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方法。

但是否还可以引出另一些联想?如:以衣貌、派头取人,乃至以某些往往还是无常的、不见得能完全代表或显示价值的身外附加物(权力金钱门第文凭等等)取人,仍不免是社会常例,有时甚至是待遇规定。而某些有幸拥有“粹白之裘”者,往往在自我陶醉于其因高贵的“裘”而抬升了的身份时,容易忘记就连那并不能说明人的价值的外衣包装,其实也是“取之众白”;容易忘记猎狐者的艰辛劳苦,制裘者的精思巧艺,更容易忘记那些为献出一点点“粹白”的毛皮,而献出全部血肉之躯的众多小小生灵。

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成就,除了本身的努力之外,都不可能不“取之众白”,取之当世的和既往的无数人所作出的业绩贡献,否则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此其一。其二呢,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党一个国家,若有所成就(特别是大的成就),就必须明白那是“取之众白”的道理。

这,大概还仅是这句古语的一部分启示。

也说思想创新

在一定意义上,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既然是创造性思维,当然就是不同于此前的思想理论的标新立异,是反常规,反正统,是一种出格,越分,甚至犯禁。如果不,那就称不上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一出现,往往惊世骇俗,引起争议、非议、震怒乃至欲加之罪。但,它是新发明新发现新知识新思路新生产力和许许多多新事新风之母。故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不过,创新或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主观上有解放思想的自觉,客观上有思想解放的环境。没有这个自觉,难产生创造性思维;没有这个环境,出现了创造性思维也常常会被禁锢扼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这类悲剧已不胜枚举。

毛泽东曾是提倡解放思想最力的人物,“双

百方针”的提出就是个勇敢正确、鼓舞人心和受到拥护的创举,但后来的实际发展却是人所共知的。他提倡百家争鸣,却又说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而无产阶级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于是乎……因此,口头上提倡创新或创造性思维,提倡解放思想,而不提倡甚至反对提倡思想多元,言论自由,实际是不准创新,不许创造性思维,压制思想解放。

独自关起门自由遐想,不管怎么想入非非,谁也管不着,也没法管,谁也不能钻进别人脑子里去搜捕思想。古时曾以“腹诽”定罪,“反右”和“文革”时也曾逼人“交代思想”、“交心”(交代出来的大多有假),并常常凭以定性定罪。但除非砍掉脑袋,就往往无效,即使关进铁栅栏也拦不住人的思想。不过仅仅“准许”个人独语私吃,并不叫思想自由,重要的是准许公开发表观点,准许自由讨论,切磋交流,使个人的创造性思维经过社会的质询诘难,补充修订,并最终认可,成为社会的思想财富。即使暂时不被社会认同或彻底被历史否定,那也有好处,终归是辨明了一些事理。这就叫公开性,透明化。公众拥有公开的思想言论自由,是创造性思维和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对思想言论的限制越繁多苛刻,创造性思维和思想解放的天地就越窄小。

上面几次用了“准许”二字,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不准”太多。人艺演出的话剧《茶馆》(上接8页)化工部不同意科学的技术鉴定,并多方设置障碍,致使《通知》不能发出。

在学习《准则》的热潮中,群众对于李国才这样弄虚作假、飞扬跋扈,继续身居高位的人,早已不能容忍。他的行径,先由《劳动保护》杂志和《工人日报》披露,经《人民日报》的醒目报道后,得到读者强烈反应。读者李廓在信写道:“揭发了李国才这样一位副部长,实在不能不使人怵目惊心: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政府机体带来的祸害,在时过数年之后,仍然如此之深,如此之烈!同时,人们也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领导体制、整顿领导作风,又是如何迫切!”读者黄仁岳在信中说:“李国才弄虚作假被揭露,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单拿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来看,无一不散发出浓重的封建主义气味。……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改

里,王掌柜茶馆就高悬有“莫谈国事”四字。在旧中国,这四个字与“谨防扒手”四字是公共场所最常见的字样,几乎成了一副短联。那是封建专制社会。可是,在新中国,例如“文革”时期,在湮没一切的“革命”语境中,不准有不同声音。新中国宪法上从来没有删去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条款,但以言论治罪者却成千上万!偌大中国曾是不光彩的偌大一言堂。既然言论自由写在宪法,那就没有准许不准许的问题,只有尊重不尊重、服从不服从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不但强调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并且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一响亮提法,与提出提前实现小康社会一样,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举世关注和赞赏。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国,肯定要在未来世界亮相,谁也挡不住。

而只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更大程度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才更快。或反过来说,社会进步有赖于多多益善的创造性思维,永无休止的思想解放。思想言论环境的宽松程度与社会进步的速度绝对成正比。

史鉴昭然,全国只许一个大脑进行“创造性思维”,其他多少亿人包括高级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只有“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那些年代,究竟是推进了还是阻滞了社会进步!

(责任编辑 吴 思)

革干部制度,让群众真正获得监督、任免领导人员的权利,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化学工业部根据劳动部门和群众的揭发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机关党委的查处意见,在10月中旬向国务院写了处理意见的报告。国务院于11月11日作出决定,撤销李国才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重温当年学习《准则》的热潮,更能感觉到其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的巨大作用。现今,20多年过去了,虽然《准则》作为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载入史册”,但至今仍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却并未引起一些党员干部的广泛重视。在党中央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今天,重温《准则》,其警示意义自然不言自明。

老 皇 帝 悲 歌

● 官伟勋

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皇帝？据一位知名历史学家讲，还没见有人统计过。

如按通常用的“十五个纪年表”上有名有年号的算，应为 307 个；如把《资治通鉴》上提到的，有名有姓称过帝的都算上，那就多了，有四五百。

在可知生死年月的 307 个皇帝中，活到 70 岁以上的只有 7 个。

所有这 7 个，无一例外，晚年都是在极度悲惨或极度失意中去世的！

是偶然现象？为什么个个如此？

是必然现象？必然之理何在？

307 个与 7 个

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要统计出个都能接受的数字不容易。

有诗道：“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扰乱五十秋。”五代是 14 个皇帝，此诗却说 15 个，不知怎么算出来的？只算五代和十国的开国皇帝倒是 15 个，但不能说那时只有 15 帝。

洪迈《容斋随笔》说：自汉高祖到五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凡百三十六君，惟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

136 这个数也不知是怎么算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时还没有皇帝，不算可以，为什么秦朝二帝、新朝王莽也没算？

从秦到晋共 55 个皇帝，五胡十六国共 68 个皇帝，南朝宋、齐、梁、陈共 27 个皇帝，北朝的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高昌共 29 个皇帝，加上五代 14 个，10 国 36 个，共 229 个。大大超过 136 这个数字。是不是老先生认为五胡十六国等“非我族类”而没算？就是不算也对不上 136 这个数。

老先生的取舍标准，我们已无法向他请教了！

洪迈生于南宋初，他只能统计到五代。

从宋到清，只算宋、辽、金（不算南诏、大理以及西夏、北辽、西辽、蒙古等地处偏远、对中原影响不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割据政权），就有 37 个皇帝。加上元朝 15 个，明朝 16 个，清朝 10 个。以上共计就是 307 个。

宋以后活过 70 岁的有 4 个：洪迈的顶头上司宋高宗，元朝的忽必烈，明朝的朱元璋，清朝的弘历（乾隆）。宋高宗赵构生于 1107 年，死于 1187 年，虽说活了 80 岁，但他在 1162 年就让位于宋孝宗赵慎了，是年 55 岁。宋孝宗上台一个月就给岳飞平了反，并立即开始商讨北伐大计，一反赵构的主和投降路线。看来，赵构是真让不是假让。因而不算在位的老皇帝。忽必烈生于 1215 年，死于 1294 年，79 岁；朱元璋生于 1328 年，死于 1398 年，70 岁；弘历生于 1711 年，死于 1799 年，88 岁。忽必烈当“皇帝”时还属蒙古，称“大汗”。当时“仍然保留着贵族议事会忽里勒台的选举制。大汗必须经过大会选举才合法。”他后来当了中国的皇帝，但不属本文要探讨的传统意义上的世袭皇帝。乾隆后来也让位当了太上皇，但让位时已经 85 岁。本文说在 307 个皇帝中只有 7 个老皇帝，是算了弘历没算赵构；算了朱元璋没算忽必烈。

为什么老皇帝少小皇帝多？

洪迈说过：（宋以前）除汉武帝等 5 人外，“至五六十（岁）者亦鲜（很稀罕）”。确实如此。除了像五胡十六国那样连年征战年代的皇帝，必需年轻力壮外，其余那些传世皇帝，不仅老皇帝凤毛麟角，成年皇帝“亦鲜”。除了养尊处优、后宫糜烂生活摧其夭折外，宫廷阴谋、激烈的你死我活的

夺权斗争,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皇帝与外国的皇帝不同。日本于三、四世纪开始有天皇之说,天皇制相传至今。但大化革新后很快大权就落在藤原氏手中。藤原家族可以随意废立天皇。所以藤原有“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的诗句。藤原家族统治了200年。1192到1868年的日本为幕府时期,政权一直在幕府将军手中。野心家们对一个没有实权,而且刚到成年就得出家当和尚(称太上皇)让位给太子的皇位,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欧洲皇帝更不像中国皇帝。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实行民主制。即使被称为“寡头贵族专政”的斯巴达,国家机构也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会议、监察官组成”。监察官可以监督国王,审讯国王。监察官5人,选举产生,一年一任。公元前510年产生的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早期的皇帝一直受教皇牵制,斗争激烈,一度造成“大空位”时期。后来“确认皇帝由七大选帝侯推选”;而且规定:“不得世袭”。波斯帝国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国教的权力很大。

中国皇帝可就厉害了!既非选举产生,更不受任何监督。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要谁死谁就得死;他的享受是无限的,普天之下的财富都是他的,天下所有美女他都可“宠幸”。

中国皇帝不仅世袭,而且必须保证“纯种”。所有接近后宫的男子,必须阉掉性功能。

像这样的权力与享受,垂涎的人当然就多了!尤其那些已经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他们的地位得来不易,加上皇帝有多疑与反复无常的毛病,今天信任有加,明天就可能人头落地。因此,种种阴谋便层出不穷了。

《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皇帝之所以常杀身旁权力最大的人,原因在此。

“欲久专政,贪立幼君。”已经掌权的权臣或太监、后妃、外戚,为免失宠被杀,就要千方百计把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什么他们一再废立小皇上?为什么一些小皇上“登基”几天就死了?奥妙在此。王莽当政,汉哀帝死了,他立9岁的刘刊当皇帝。刘刊14岁了,王莽还怕他“春秋益壮”,趁“腊日上椒酒”毒死了。再立个2岁的刘

婴当皇帝,规定乳母不得与刘婴说话。“至于长大”,刘婴连猪马牛羊都叫不出。汉和帝死了,邓后立不满百日的刘隆为帝。第二年刘隆死了。又立13岁的刘祐为帝,没几年又死了。又立刘懿,三月立,十月又死了。

如此折腾,“五六十者”怎能不“鲜”!

小皇帝多老皇帝少是由“有中国特色的皇帝”的特色决定的。这特色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监督的权力太大,太集中,太专制独裁。

七个老皇帝当年都曾 雄才大略无比辉煌过

我国历史上这仅有的7个活到70岁以上的皇帝:汉武帝刘彻、吴大帝孙权、唐高祖李渊、唐明皇李隆基、梁武帝萧衍、明太祖朱元璋、清高宗弘历,可说,当年个个都是灿烂的巨星,创建过骄人的业绩。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是举世公认的。他削弱割据势力,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用“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为思想武器,加强中央集权,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封建制度。他打击富商大贾,把冶铁、煮盐、铸钱收归官营。他在京师设平准官,在各地设均输官,由政府进行运输与贸易。互通有无,平抑物价,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他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到边疆屯田,发展了农业,增强了国力。之后,便开始反击匈奴贵族的侵扰战争。他派使者去西域,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同时消灭了南方边疆的割据政权。

有人曾指责汉武帝反击匈奴贵族是好大喜功。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

秦亡汉兴,匈奴在北方崛起。冒顿单于频频南下入侵,民不聊生。刘邦曾率军抵抗,在平城差点全军覆没。匈奴强大,“高祖患之”,只好“奉宗室女公主”给单于当老婆,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古人虽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诗句,实际上,就当时的传统观念看,把公主远嫁到漠北“番邦”,是很痛苦很屈辱的事!冒顿对汉王朝极尽侮辱之能事。吕后当政,冒顿写信给吕后说:“我生在沼泽之中,长在平野牛马的地方”,“你一个人,孤单单的,咱俩都不快乐,活的没意思。我愿以我所有,补

你所没有。”吕后气的要命,但最后还是因为国力不行,回信说:“单于没忘了我们这穷地方,赐信给我,我很恐惧。我年老气衰,头发牙齿掉了,走路也困难了,不像你听说的那样,不足以玷污你。”最后的结语是:“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屈辱到了极点!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贵族战争,是出于保障边疆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需要,是正义的。他终于重创了匈奴贵族,赢得了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定。

汉武帝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华民族兴盛的贡献是巨大的。两千多年来,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能一直以一个稳定的实体与规模屹立于世界东方,是与封建时代早期的秦始皇和汉武帝,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分不开的。

常说吴大帝孙权是“弟继兄业”经营江东。实际上生前被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的孙策,只活了25岁。真正创建东吴,识拔人才,赢得江东士民拥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争得与魏、蜀三分天下的是孙权。联刘破曹于赤壁;袭荆州,斩关羽;在猇亭大破刘备连营七百里,都是孙权的不朽业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大规模地派人航海,舰队到过台湾。这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孙权对江南的开发功不可没。

喜爱文学、音乐,曾创准音器皿具,又制长短不同的12支短笛以应12律的梁武帝萧衍,是个多才多艺的皇帝。在任雍州刺史时,乘齐内战起兵夺权。斯时,群雄并起,大局糜烂,萧衍在问鼎南京的过程中,也确有一番纵横捭阖善于应对的成功表演。他能成一代开国君主并不是偶然的。

为突出李世民,唐高祖李渊往往被说得很平庸。实际上他也不失为一代英豪。他任卫尉少卿时,“御众宽简,人多附之”。隋炀帝“以渊相表奇异,名应图讖,忌之”。他知道了,“纵酒纳赂以自晦”,以韬晦之功保存了自己。“盗贼蜂起”,民部尚书樊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以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局势进一步恶化。李渊则“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他很懂人心向背的重要,“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当“人情汹汹,思乱者益众”,同人蠢蠢欲动时,他却隐忍不



乾隆

发,暗中加紧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一发而定大局。

唐初由大乱到大治,自然应归功于李世民、武则天,但大唐最兴盛的时期,是在唐明皇时。他重用贤相姚崇、宋璟,轻徭薄赋,减省刑法,革除一切弊政,出现了“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时期的所谓“开元之治”。随着经济的繁荣,对外交通的发达,大唐成了当时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从世界各地到处有唐人街的称谓也可见盛唐影响之大。

朱元璋由一个小行童、游方僧、九夫长、小军官,凭英勇作战与卓越的组织指挥当上大元帅。鄱阳湖决战,取东吴,南征北伐,终于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起大明帝国。当了皇帝后,他依旧保持了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作风。他早起晚睡,把全部精力时间都用在政务上。一个小和尚出身的人,竟然能总结历代统治的经验和元朝90年的成败教训,大刀阔斧地对中央政权进行改革,由皇帝兼丞相,使封建时代的中央集权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使自己成了历代权力最大的君主。没有超人的智慧过人的能力是办不到的。

弘历(乾隆)虽说是沾了他祖父、父亲给他打下的良好基础的光,但他登基后,能继续推行地丁

制度,多次减免田赋,使人口大增,使主要农业区数十年没有战争,不能不说是他主政的成功。在军事上,他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削平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势力。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完成他自夸的“十大武功”。拒绝英国特使提出的侵略性要求,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心,巩固了边疆,加强了统一。在文化上,开博学鸿词科,访求书籍,完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的编纂。弘历的贡献不可低估。

善始不善终 个个 晚景悲凉抱恨终生

可惜的是,这七位当年风流一时的君主都无善终。他们晚年都很不幸,都怀着永恒的遗憾告别人世!

洪迈在《人君寿考》中说过以下一段话:“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流离迁徙,逃难)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



唐玄宗吹箫图

洪迈对宋以前的五位老皇帝的概括,可以说言简意赅。宋以后的,后边将简做介绍。这里先就汉武帝的晚年补谈一二。因为他是老皇帝中更具典型意义的一位。

汉武帝曾何等英明!晚年却骄傲了,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文过饰非了。种种“失误”接踵而来却不得纠正。正像司马光说的:“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一个极聪明的人,竟然干起封禅,祀神求仙,重用骗子,追求长生,妄想白日升天、让死去的爱妃再生等蠢事来。

更糟糕的是他开始疑神疑鬼,先是以“巫蛊”罪杀了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等人。后又怀疑爱子戾太子。他“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由于“邪臣多党羽”,所以说太子好话的少,说太子坏话的多。

将来谁接班,是关系两派大臣升降死活的大问题。怕太子接班的人就极力诋毁太子。有的说太子调戏“宫人”;有的说太子听说皇帝身体不好“面有喜色”。更阴险的是,在汉武帝生病期间,搞阴谋的人竟在太子住地埋了大量木人,污蔑太子

用“巫蛊”之术咒汉武帝早死。

“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结果“发现”太子宫地下“确有木人”而且很多。太子又怕又气,要杀江充,江充诬太子造反。汉武帝下令平叛,太子逃到民间,上吊而死。汉武帝后来发现太子受冤,悲痛万分,但已晚了。这时,由于他挥霍无度,徭役繁重,农民大量流离失所,各地已纷纷发生农民起义。死前不久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在极度悲苦的心情中走完一生。

朱元璋的悲剧也发生在“接班人”身上。他少年时代过的是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的苦日子,中年过的是白刃相接的戎马生活,40

岁后，把全部精力不分昼夜地用在处理政务巩固统治上，所以50岁后他便体力不支了。时发高烧，好幻想，作怪梦，喜怒无常。但最使他苦恼的是他与儿子的矛盾。

儿子受的是儒家教育，大讲周公、孔子之道。他则强调以猛治国，用专政机构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儿子讲仁政讲慈爱，杀人越少越好。他要把有功有影响的大臣大将都杀光，“把手杖上的刺儿都去掉”，以便儿子将来掌权。儿子要照顾将相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意，兄弟友爱。宋濂得罪，儿子求情，朱元璋怒道：“等你作皇帝赦他！”皇太子吓得投水自杀。虽经救起，身心已受创。洪武二十五年太子病死。老皇帝伤心至极，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头发胡子全白了。只好立16岁的允炆为皇太孙。怕孙子控制不了局势，又把仅剩下的傅有德、冯胜等几位元勋杀了。朱元璋也是在极其悲伤与不安中了结一生的。他处心积虑安排的和平交班也没实现。他死不久，朱棣就发动了血腥的“靖难之役”，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下落至今是个谜。

乾隆在最高权力位子上，一干就是60年。天天听“吾皇圣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灼热的歌颂与吹捧，不要说听60年，就是不断地听十年八年，也会把人熔化得变质发生异化。乾隆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糜费特甚”。地方官为讨好他，修行宫、搭彩棚、办筵席，“酒无虚日，城开不夜”。自北京到杭州，来回近6000里，修行宫30处。共用船千余艘，光皇帝后妃5艘船的纤夫就2600名。马6000匹，骡马车400辆，骆驼800只，征调夫役近万。每天还要“赐酒、赐食，所费不资”。以上还只不过是铺张浪费的一小部分。

尤其严重的是，他明知和珅是俳优弄臣，却偏要重用他。结果是：“和珅以二十年的宰辅，惟知聚敛自丰，朝臣疆吏，辇货权门，结为奥援，虽大狱屡兴，而吏治益坏，上下征利，贪黷成风，一般老百姓皆蹙额兴叹！”大清国运，从此衰败。“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得安宁。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老账应从乾隆算起。

老皇帝综合症的历史教训

仅有的七个老皇帝都没有好结果？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

人老，不仅肢体老化，智慧也老化。走路颤颤巍巍；写字哆里哆嗦；说话啊啊半天说不清一句囫圇话。不仅理解、推论、分析、概括、反应能力衰退，视听都成问题。

老态龙钟了就怕在臣民面前露怯，只好事事靠所谓“近习”。而这些捶背送水捧痰盒端尿壶伺候便桶的人，大都是些没什么学问，私心很重，易被利用，“有奶便是娘”的人。而一线执政大员却难得见皇帝一面，因而上下梗阻，老皇帝最易被小人包围封锁。

多疑是老皇帝的又一通病。而最令他不放心的，首先是那些最有资格接班的人，以及那些有威望的能臣武将。他老担心他们在外边搞什么名堂，因而很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听信谗言杀戮忠良自毁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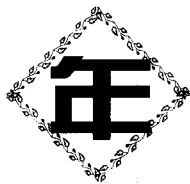
天天听“万岁”、“吾皇圣明”，到处被当作神明奉承，久而久之，自己也就自以为是神明了。因而越老越自以为是，越听不得反面意见。有人提点不同意见，就容易被怀疑为不尊重或有野心。“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有了错误难纠正，只有一错到底！

以上可称之为“老皇帝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甚至会导致国破家亡，像梁武帝那样。是国之大患，却一犯再犯，无一幸免，就在于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土壤在。

帝制在我国早被推翻了。帝王思想残余却远未消亡。

形式相似往往导致内容类似。没有皇帝，只要有衰老与终身绝对权力的结合，“综合症”的某些症状就难免出现。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把工作中心由搞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还表现在他建议废除党的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与实行任期制这一远见卓识上。正是这一决策，开辟了我们党的领导职务实行理性的科学的制度化的交接的光明大道。这在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中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国来说却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性进步，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保证。走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终于走出了某些封建残余的可怕阴影。（责任编辑 致 中）



本刊编辑部

一个多月前，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在开头和结尾处，响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号召。这是符合世界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主张，本刊编辑部热诚拥护。

在过去的一年里，本刊介绍了各类政治体制运行的历史经验，民主的和专制的，中国的和西方的，成功的和失败的，近当代的和古代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更加自觉地介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更多的历史借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有活力的文明，任何有效的制度，都是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共同参与和共同建

设的结果。民主政治虽然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却不是简单号召一下就能实现的，也不是单纯等待就可以自动降临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土改到大包干，从改革开放到小康社会，任何一点真正的进步，都是人民大众积极争取奋斗的成果，都是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换来的。我们的参与方式，就是努力办好这份杂志，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尽力标明正道和歧路，为艰苦跋涉者提供一幅可参考的地图。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文明建设前景抱有乐观态度。回顾近百年来中国历史，自从辛亥和五四先贤举起民权

和民主的大旗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在各种各样的试验和探索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今人的思想更趋成熟，认识更趋正确。二十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为祖国政治文明打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的新型政治文明已经呼之欲出，渐呈水到渠成之势。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第五部分的论述表明，执政党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顺应大势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本身就有助于执政党地位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

但愿今天的人们给未来的历史留下漂亮的一笔。

本期：终审 徐 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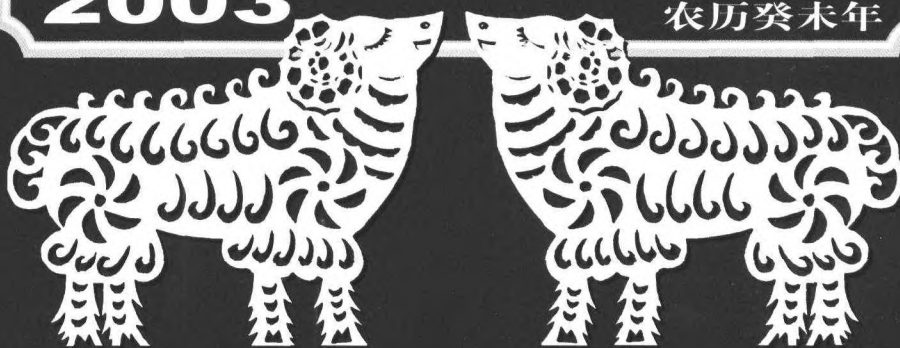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

恭贺新禧

2003

农历癸未年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廿九	三十	十二月	初二	
5	6	7	8	9	10	11
初三	小寒	初五	初六	三九	初八	初九
12	13	14	15	16	17	18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九
19	20	21	22	23	24	25
十七	大寒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26	27	28	29	30	31	
廿四	五九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正月	
2	3	4	5	6	7	8
初二	初三	立春	六九	初六	初七	初八
9	10	11	12	13	14	15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九	元宵
16	17	18	19	20	21	22
十六	十七	十八	雨水	二十	廿一	廿二
23	24	25	26	27	28	
八九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廿九
2	3	4	5	6	7	8
三十	二月	九	初三	惊蛰	初五	初六
9	10	11	12	13	14	15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16	17	18	19	20	21	22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春分	二十
23	24	25	26	27	28	29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30	31					
廿八	廿九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三十	三月	初二	初三	清明
6	7	8	9	10	11	12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13	14	15	16	17	18	19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20	21	22	23	24	25	26
谷雨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27	28	29	30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四月	初二	初三		
4	5	6	7	8	9	10
初四	初五	立夏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11	12	13	14	15	16	17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18	19	20	21	22	23	24
十八	十九	二十	小满	廿二	廿三	廿四
25	26	27	28	29	30	31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五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初二	初三	初四	端午	初六	芒种	初八
8	9	10	11	12	13	14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22	23	24	25	26	27	28
夏至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29	30					
三十	六月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6	7	8	9	10	11	12
初七	小暑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13	14	15	16	17	18	19
十四	十五	十六	初伏	十八	十九	二十
20	21	22	23	24	25	26
廿一	廿二	廿三	大暑	廿五	廿六	中伏
27	28	29	30	31		
廿八	廿九	七月	初二	初三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初四	初五	
3	4	5	6	7	8	9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立秋	十二
10	11	12	13	14	15	16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未伏	十九
17	18	19	20	21	22	23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处暑
24	25	26	27	28	29	30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八月	初二	初三
31						
初四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7	8	9	10	11	12	13
十一	白露	十三	十四	中秋	十六	十七
14	15	16	17	18	19	20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21	22	23	24	25	26	27
廿五	廿六	秋分	廿八	廿九	九月	初二
28	29	30				
初三	初四	初五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初六	初七	初八	重阳		
5	6	7	8	9	10	11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寒露	十五	十六
12	13	14	15	16	17	18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19	20	21	22	23	24	25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霜降	十月
26	27	28	29	30	31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八	
2	3	4	5	6	7	8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立冬
9	10	11	12	13	14	15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16	17	18	19	20	21	22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23	24	25	26	27	28	29
小雪	十一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30						
初七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7	8	9	10	11	12	13
大雪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14	15	16	17	18	19	20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21	22	23	24	25	26	27
廿八	冬至	十二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28	29	30	31			
初六	初七	初八	二九			

《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恭贺本刊读者羊年愉快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3/1 总第130期

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张学良口述历史形成经过

毛泽东弟媳庞淑谊的平民生活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老皇帝悲歌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